

全球智库半月谈

欧盟-英国关系重置的贸易政策框架

特朗普宣布征收关税，对欧盟构成挑战

世界贸易体系能否经受住唐纳德·特朗普的考验？

美国正在经历制造业复兴，这将促进中产阶级的发展？

错误的恒等式导致糟糕的贸易政策

打破银行的信息垄断：存款数据共享的理由

货币政策的绿色困境

本期编译

廖世伟

熊春婷

张丝雨

赵元彬

（按姓氏拼音排序）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

《全球智库半月谈》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和国际战略研究组承担的编译项目，每半月定期发布。所有稿件均系网络公开文章，由项目组成员依据当前热点编译组稿。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全球宏观经济研究组

顾问	张宇燕			
首席专家	张斌		姚枝仲	
团队成员	曹永福	美国经济	陆婷	欧洲经济
	冯维江	日本经济	熊爱宗	新兴市场
	徐奇渊	中国经济	杨盼盼	东盟与韩国
	肖立晟	国际金融	李远芳	国际金融
	常殊昱	跨境资本流动	顾弦	大宗商品
	陈博	大宗商品	吴海英	对外贸易
	崔晓敏	对外贸易	熊婉婷	金融政策
	王地	宏观经济	张寒堤	科研助理

国际战略研究组

组长	张宇燕			
召集人	徐进		协调人	彭成义
团队成员	李东燕	全球治理	袁正清	国际组织
	邵峰	国际战略	徐进	国际安全
	薛力	能源安全	欧阳向英	俄罗斯政治
	黄薇	全球治理	冯维江	国际政治经济学
	王鸣鸣	外交决策	高华	北约组织
	卢国学	亚太政治	王雷	东亚安全
	彭成义	中外关系	徐秀军	全球治理
	田慧芳	气候变化	李燕	俄罗斯政治
	任琳	全球治理	丁工	发展中国家政治

联系人：王琬婷 邮箱：wangwanting@ucass.edu.cn

电话：(86)10-8519 5775 传真：(86)10-6512 6105

通讯地址：北京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1544 邮政编码：100732

免责声明：

《全球智库半月谈》所编译的文章，仅反映原文作者的观点，不代表编译者、版权所有人或所属机构的观点。

目 录

世界热点

欧盟-英国关系重置的贸易政策框架 6

导读：英国和欧盟之间的关系正在进行重置，双方已同意于 2025 年上半年举行欧盟-英国峰会。届时，对于此次关系重置可能对欧盟和英国之间的贸易产生的影响，预计将会有更清晰的认识。本文提出了贸易条件重置的主要内容。这份政策简报的建议旨在主要为欧盟-英国贸易关系注入新动力，重点在于实现互利共赢。

特朗普宣布征收关税，对欧盟构成挑战 18

导读：特朗普宣布对墨西哥、加拿大和中国征收关税表明美国正在坚定推行保护主义政策，甚至可能损害自身利益。这一举措对欧盟构成了警示，欧盟需为可能针对自身的美国保护主义政策做好准备。欧盟应通过与美国达成特定领域的贸易协议来减少短期经济损失，同时多元化贸易关系，增强军事自卫能力，以提高谈判地位。维护全球贸易秩序至关重要，因为世贸组织的崩溃将对欧盟经济造成比美国关税更为严重的影响。

世界贸易体系能否经受住唐纳德·特朗普的考验？ 19

导读：世界贸易体系面临的最突出的新挑战是，最近再次当选的美国总统明确表示打算对所有进口产品征收 10% 或 20% 的关税，但来自中国的进口产品将被征收 60% 的关税。目前，近 200 个国家的贸易部门正在进行对话：他们是否应该提供利诱，让美国总统让步？他们应该报复吗？如果无法达成协议，一些国家将会决定他们别无选择，只能采取行动。

美国正在经历制造业复兴，这将促进中产阶级的的发展？ 22

导读：尽管拜登计划将刺激非传统地区制造业就业的快速增长，但并没有带来美国制造业的广泛复兴，未来也不太可能实现。随着拜登项目拨款的发放，可能会有更多的公告。然而，更新数据的结果不太可能改变这一分析的核心结论。即使额外的公告将制造业就业人数估计再增加 50%，制造业在美国整体就业中的作用也将非常有限。为了改善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工人和落后社区的前景，需要更多的政策，其关注范围远远超出制造业。

经济理论

错误的恒等式导致糟糕的贸易政策 33

导读：本文探讨了美国贸易赤字及其对经济政策的影响，对基于宏观经济恒等式的贸易赤字理论进行了批判，指出这些理论常被误用来支持保护主义政策。本文分析了国民收入与产品恒等式以及国际收支恒等式的滥用，强调这些恒等式不能解释贸易赤字的成因或影响。文章指出，贸易赤字并不必然导致就业减少或经济增长放缓，而是反映了国内需求的强劲。作者还反驳了将贸易赤字与双边贸易赤字机械联系的观点，认为这种联系忽视了经济均衡关系。最后，作者发出警告，基于恒等式的简单化政策建议可能会造成意外的经济损害，而不能解决贸易赤字问题，同时呼吁进行更深入的经济分析，以制定有效的贸易政策。

打破银行的信息垄断：存款数据共享的理由 43

导读：现有银行通常对其借款人保持信息垄断，这使得借款人难以转向竞争性贷款机构或协商更好的贷款条款。本文认为，存款关系可能是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案，从而促进更具竞争力的贷款市场。研究表明，与竞争银行有存款关系的企业显著更可能更换贷款机构。与此同时，银行会为那些在其银行开立存款账户的企业提供更优惠的贷款条件。这些研究结果对当前的政策举措具有重要意义，如开放银行和数据共享、存款市场改革以及竞争政策等领域。

货币政策的绿色困境 46

导读：加速向绿色经济的转型势在必行。本文指出，绿色转型将为中央银行带来权衡取舍的挑战。淘汰污染性技术可能会在短期内放缓生产率增长，从而带来通胀压力。如果中央银行选择“视而不见”，允许通胀暂时上升，那么通胀预期可能会失去锚定。相反，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将导致失业率上升、绿色技术投资减少，并可能对国内生产总值（GDP）和绿色转型造成永久性损害。通过财政和信贷政策支持绿色投资，或许是应对这些权衡取舍的最佳选择。

本期智库介绍 51

欧盟-英国关系重置的贸易政策框架

Ignacio García Bercero/文 廖世伟/编译

导读：英国和欧盟之间的关系正在进行重置，双方已同意于 2025 年上半年举行欧盟-英国峰会。届时，对于此次关系重置可能对欧盟和英国之间的贸易产生的影响，预计将会有更清晰的认识。本文提出了贸易条件重置的主要内容。这份政策简报的建议旨在主要为欧盟-英国贸易关系注入新动力，重点在于实现互利共赢。编译如下：

执行摘要

英国和欧盟之间的关系正在进行重置，双方已同意于 2025 年上半年举行欧盟-英国峰会。届时，对于此次关系重置可能对欧盟和英国之间的贸易产生的影响，预计将会有更清晰的认识。目前，欧盟与英国的贸易受《欧盟-英国贸易与合作协定》（TCA）的管辖。

英国仍然是欧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改善欧盟与英国之间的贸易关系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本政策简报建议，贸易关系重置的主要内容应为：

- 通过新的部长级论坛加强在全球贸易和经济挑战方面的合作；
- 谈判达成三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以补充《欧盟-英国贸易与合作协定》：一项兽医协议、一项连接碳排放交易系统的协议，以及一项关于青年流动和文化便利化的协议；
- 建立一个新的框架来加强监管合作。

这些建议的主要目的是为欧盟-英国贸易关系引入新的动力，侧重于实现互利共赢。所建议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定的经济影响可能是有限的，但它们将有助于重建相互信任，并采取一些有意义的贸易便利化步骤，最终达成进一步的贸易便利化协定。强化的监管合作框架虽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如果能真正努力保持监管制度的兼容性，可能会产生更大的经济影响。

本政策简报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与布鲁盖尔同事、利益相关者、智库成员和学术界的讨论。我要感谢 Catherine Barnard、Charles Grant、Michael Gasiorek、David Henig、Peter Holmes、Emily Lydgate、Sam Lowe、Ivan Rogers、Tom Scholar、Alan Winters 和 Georgina Wright 对本报告前几稿的评论。

一、引言

英国对欧盟贸易的依赖是有据可查的——英国 42% 的出口去往欧盟，52% 的进口来自欧盟（Webb and Ward, 2024）。而较少被提及的是，考虑到商品和服务两方面，英国是欧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Henig, 2024）。欧盟-英国贸易关系受《2021 年贸易与合作协定》的规定管辖，其中包括一项自由贸易协定，该协定规定全面取消关税并在与贸易相关的领域制定全面规则。当然，这与参与欧盟单一市场的深度一体化相去甚远，而欧盟与欧洲经济区以及（在较小程度上）与瑞士签订的协议则具有这一特点。

自 2019 年以来，英国的整体贸易有所下降。2023 年的数据显示，自那时以来，货物出口和进口分别下降了 13.2% 和 7.4%，但服务贸易增长了 14%（南联盟，2024 年）。与其他 G7 经济体不同，英国贸易疫情以来尚未恢复（图 1）。人们普遍认为，英国脱欧将对英国整体贸易以及与欧盟的双边贸易产生负面影响。然而，确定影响的程度是困难的，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反事实/基准的选择。

图 1: 贸易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2019=100）



资料来源：Bruegel 基于经合组织（OECD）的数据。注：*不包括英国。

Du 等人（2024）指出，在贸易方面受英国脱欧影响最大的行业是农业食品、纺织品和服装以及以材料为基础的制造业。这显示了供应链中断导致的进口减少与出口下降之间的紧密联系。对于小型企业而言，由于需要承担与遵守海关手续相关的固定成本，这些成本可能尤为显著。

这一贸易数据与估计结果一致，即脱离单一市场会产生巨大的经济影响，而缔结自由贸易协定（FTAs）无法弥补这一影响。英国预算责任办公室根据一项研究回顾估计，退出单一市场和关税同盟对英国的长期影响将在 GDP 的 4% 至 5% 之间，长期贸易强度将下降 15%。就自由贸易协定的抵消效应而言，英国对其最重要的自由贸易协定——《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步协定》（CPTPP）——的影响的评估仅占 GDP 的 0.06%，还应加上与澳大利亚的自由贸易协定的 0.08% 的估计影响，因为这是在 CPTPP 之前达成的，而欧盟与澳大利亚没有自由贸易协定。即使英国与美国和印度缔结自由贸易协定，其所有自由贸易协定对 GDP 的累积影响也不会超过 1%（Berg, 2024）。

尽管存在负面影响，但英国和欧盟都不认为现在是对 TCA 进行重大改革的时候。基尔·斯塔默（Keir Starmer）首相政府的红线——不允许人员自由流动、不加入单一市场、不加入关税同盟——与 2017 年时任首相特蕾莎·梅（Theresa May）在政府脱欧谈判目标中提出的红线极为相似。同时，欧盟多次明确表示，

TCA 及随后涉及北爱尔兰贸易问题的《温莎框架》（Windsor Framework）为欧盟与英国的贸易关系提供了稳定的基础，认为 2026 年对 TCA 的审查应重点关注实施情况，而非重新谈判。

因此，我们认为，在此阶段英国重新考虑其红线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英国脱欧辩论分歧太大，没有兴趣让与欧盟的关系再次成为政治争议的主要话题。此外，尽管英国工党政府在议会中占绝对多数，但它仍然对在 2016 年公投中投票支持英国脱欧的选民感到担忧。从欧盟的角度来看，对 TCA 进行重大的重新谈判将分散人们对其所面临的经济和地缘政治挑战的注意力，特别是因为重新谈判不太可能为欧盟-英国关系带来更稳定的政治基础。

然而，如果双方采取战略性的方法来处理贸易关系，仍然存在巨大的互利机会。英国工党在 2024 年英国大选前的宣言中表示，它将“通过拆除不必要的贸易壁垒，努力改善英国与欧盟的贸易和投资关系”（工党，2024）。英国首相 Keir Starmer 和欧盟委员会主席 Ursula von der Leyen 同意在 2025 年上半年举行欧盟-英国峰会。因此，关系重置正在进行。

在讨论了英国和欧盟红线的潜在逻辑以及在不违反红线的情况下仍可探索的选项后，我们评估了欧盟和英国可以采取的措施，以更紧密地合作应对全球贸易和经济挑战。然后，我们概述了在 2026 年底之前可以谈判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贸易便利化协定的三个领域，并讨论了如何为监管合作建立更坚实的基础。

二、跨过红线

并非所有英国与欧盟关系中的红线都具有相同的政治相关性。移民控制不允许自由流动，依然是工党在 2024 年英国大选中必须争取的核心问题。然而，英国经济增长的基础是偏离欧盟法规或与遥远的国家缔结自由贸易协定的这一观点，可能不会获得太多支持。经验表明，在大多数情况下，与欧盟规则的背离比说起来容易，因为引入自主的监管制度和因失去单一市场待遇而破坏价值链的成本较高。尽管英国在最初复制并最终达成新的自由贸易协定方面相当成功，但这些协定的经济效益相对较小。

从欧盟的角度来看，英国脱欧谈判期间的主要红线是四大单一市场自由的不可分割性。重要的是要认识到，欧盟立场的基本原理是，单一市场的建设是基于这样一个原则，即成员国在一项具体的单一市场立法中可能会被否决，但四大自由和欧盟共同预算所代表的利益是总体平衡的。允许第三国只选择单一市场的某些方面将破坏这些基础。因此，流动自由和预算贡献一直是单一市场参与的协议中的核心内容，特别是对于相对富裕的欧洲经济区（冰岛、列支敦士登、挪威）和瑞士。

因此，悲观主义者可能会得出结论，由于欧盟和英国都坚持其既定的红线，任何超出 TCA 和温莎协议的重置都可能对贸易影响有限。但如果政治意愿在红线周围探索灵活性的边际，就可以避免重复脱欧谈判。值得注意的是，与

2017 年的 Theresa May 不同，工党政府没有排除对动态监管调整的承诺或承认欧盟法院的作用。目前正在英国议会讨论的产品安全规则可能为保持与欧盟的监管对接提供法律依据。这为此前保守党政府所没有的机会创造了可能性。欧盟从未排除在双方有足够的共同利益时达成部门性协议的可能性。

为了让重置对贸易关系产生有意义的影响，谈判需要在最高政治层面进行。在 2025 年上半年举行的第一次欧盟-英国峰会上，可能会决定是否启动谈判。为了保持战略重点，双方应优先考虑迅速达成一项政治宣言，其中应包括在外交政策和安全以及全球贸易和经济挑战方面的合作。

三、设立全球贸易和经济合作部长级论坛

自英国投票脱离欧盟以来，贸易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当时，美国仍在与欧盟谈判太平洋地区的全面自由贸易协定。如今，无论是欧盟还是英国，都没有与美国谈判具有经济意义的自由贸易协定的现实前景（也没有美国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可能性）。此外，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的回归可能引发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重大挑战，而欧盟和英国有兴趣以协调的方式管理这一伙伴关系。

贸易政策现在还需要考虑如何在中美地缘政治竞争的背景下促进经济安全，如何为气候和数字化转型做出贡献，以及如何在提高生产率和增长的同时确保贸易和产业政策之间的正确衔接。作为高度依赖国际贸易的经济体，欧盟和英国都有至关重要的利益来管理这些转型，以维护并有望加强世界贸易组织（WTO）下基于规则的贸易体系，并巩固与致力于开放和基于规则的贸易的国家的伙伴关系。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应该建立一个政治论坛，让双方能够从战略角度审视贸易和全球经济挑战，包括考虑权衡取舍，并探讨如何在全球范围内最好地促进共同利益。

英国外交大臣 David Lammy 提议英国和欧盟就外交政策和安全合作框架达成一致，并建议该框架还应包括经济安全和气候合作。关于外交政策和安全合作的联合声明可能是重启的早期结果。但是，也有必要考虑一个更广泛的政治声明，涵盖外交政策、安全以及全球经济和贸易挑战方面的合作。

在这些问题上的有效合作需要欧盟委员会高级官员和英国政府部长（外交部除外）的充分参与。政治宣言可以创建一个部长级论坛，定期开会讨论全球贸易和经济挑战，并向欧盟-英国峰会报告。在贸易方面，论坛最初可以讨论四个合作领域，但今后可以扩大到其他领域。

3.1 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与经济安全

欧盟和英国面临的最直接威胁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这当然是一个硬安全威胁。作为回应，欧盟和英国在实施经济制裁方面进行了密切合作。在经济安全方面，西方盟国在气候转型所需的关键原材料上高度依赖中国，同时在半导体方面依赖台湾。此外，保持共同的技术领导地位并防止军事应用技术的泄露

也是必要的。制定风险缓解战略以应对这些威胁需要作出艰难的权衡。欧盟和英国都不希望采取会妨碍经济增长、实现气候目标或支持 WTO 规则框架的政策。

特朗普政府可能选择放弃世贸组织改革的努力，特别是与争端解决改革有关的改革。特朗普还威胁要对所有世贸组织成员征收 10%至 20%的关税，对中国征收 60%的关税。这对基于规则的体系构成了生存威胁。英国和欧盟有兴趣进行合作，以确保世贸组织继续发挥作用。第一步是英国加入多方临时仲裁协议并合作寻求扩大其成员资格。除了 WTO 外，欧盟和英国可以合作制定经济安全方针，既承诺开放贸易，又以适当的方式应对经济安全挑战。这可以为 G7 经济安全讨论中形成共同立场提供基础，包括与日本等持有类似观点的国家合作。

3.2 贸易与气候

欧盟和英国将是在边境采取碳排放措施的先行者。因此，他们可以考虑共同发起一项外交倡议，加强国际合作，推动碳定价。该倡议应认识到碳定价计划（和碳价格）的多样性，以及支持发展中国家根据其机构能力和国内需求建立和进一步发展碳定价计划的必要性。

该倡议应向其他拥有碳价格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开放，如加拿大、日本或韩国。它也应该对 G20 中的新兴经济体开放。将涵盖的问题可能包括碳定价方案的互操作性，包括在实施边境碳措施时如何考虑其他司法区的碳定价、对能力建设的支持以及对电力行业脱碳的财政支持。欧盟和英国也可以考虑在适当的保障措施下，免除最不发达国家的边境碳排放措施。

3.3 贸易和产业政策

欧盟和英国都打算利用产业政策来促进增长和提高竞争力。2024-2029 年欧盟委员会可以探索在欧盟层面制定一项产业政策，其中将包括在许多情况下使用补贴来促进绿色技术的部署，协助能源密集型产业的脱碳，并避免过度依赖。英国政府也宣布有意将新工业政策作为其重点项目之一。

TCA 包括了比其他贸易协议更广泛的补贴承诺。这些“公平竞争”条款在内容上较为模糊，但为在一方认为补贴可能对贸易和投资产生重大负面影响时采取补救措施提供了权利。随着双方更频繁地使用补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可能更大。因此，负责监督 TCA 实施的欧盟-英国伙伴关系理事会（EU-UK Partnership Council）可能会就哪些类型的能源和环境补贴通常不会对贸易和投资产生负面影响提供指导。这将提供更大的可预测性，因为在欧盟和英国实施的许多补贴将与气候转型有关。

关于 TCA 公平竞争条款在补贴实施方面的更详细指导，不仅对双边贸易具有重要意义，也可能为 WTO 关于如何改进补贴国际规则的非正式讨论提供有

用的输入。欧盟和日本与第一届特朗普政府就这些问题进行了有益的讨论，探讨新一届特朗普政府是否有兴趣进行这些讨论是有价值的。

3.4 与印太地区的贸易关系合作

英国是 CPTPP 的成员。而欧盟则与大多数 CPTPP 成员国达成了贸易协定。尽管欧盟不可能加入 CPTPP，但加强与太平洋地区国家的贸易关系具有战略利益。欧盟和英国可以讨论 CPTPP 成员国、欧盟与韩国等这类与欧盟和大多数 CPTPP 成员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之间更广泛的合作。这种合作可以涵盖世贸组织改革的潜在共同原则、与绿色和数字化转型有关的监管挑战、供应链弹性和经济安全。在《泛欧洲-地中海公约》模式的基础上，通过一项关于原产地规则的共同议定书，补充 CPTPP 规则和欧盟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规则，从而纳入市场准入内容，也可能是有价值的。

欧盟和英国需要决定最佳的制度框架，以推动在全球贸易与经济问题上的合作。根据 TCA 设立的专业委员会主要聚焦于 TCA 章节的实施，并不适合就经济安全、贸易与气候等问题进行开放讨论，或在 WTO 中推动相关倡议。此类讨论最好在部长级论坛上进行，该论坛可以在 G7 和 G20 会议期间以及欧盟-英国峰会之前举行，以报告所取得的进展。论坛将负责落实第 2 节提及的政治声明中的贸易与经济方面内容，而外交政策和安全将有独立的跟进轨道。

4. 谈判与贸易有关的部门协定，以补充或改进 TCA

TCA 还远远没有发挥出它的潜力。自 2023 年关于北爱尔兰的温莎框架缔结以来，欧盟和英国建立了更加合作的关系，这应当有助于在不同委员会和欧盟-英国伙伴委员会中推动协议的实施讨论，与此同时，TCA 也预见到了谈判补充协议的可能性，这些协议可以补充 TCA 或修改其某些方面，例如扩大服务业承诺或修改原产地规则。此外，也有可能是在 TCA 共同制度框架之外谈判单独协议。

根据双方指出的优先事项，可以就三个部门协定展开谈判：（1）兽医协定，在可行的最大限度内减少对农业和渔业产品的边境管制；（2）排放权交易制度的衔接与边境碳措施的协调；（3）促进青年和文化交流的流动性协议，以及 TCA 服务章节中的其他商业流动性承诺。除了经济收益外，基于监管协调和不对双边贸易适用边境碳措施的兽医协议将大大减少温莎框架下的潜在紧张领域。

在启动部门性协议的谈判之前，范围界定工作应使人们清楚地了解可能达成协定的参数。这对于避免谈判任务不一致的风险至关重要。为了取得成功，谈判应该确定对双方都有利的方法。每个部门的谈判都需要在相互利益方面保持平衡。这样就有可能在某些领域达成协议，即使在其他领域仍在进行谈判。

同时，只有承认双方的重大利益，谈判才能取得成功。例如，如果在 2026 年后仍未就稳定的渔业资源准入制度达成协议，那么很难想象达成一项兽医协议，这将大大简化渔业产品贸易。本文讨论的协议应当伴随一项促进电力贸易的协议，因为这对双方可能带来重大利益。

4.1 兽医协议

英国已将兽医协议确定为重启欧盟-英国贸易关系的优先事项，但尚未澄清其所考虑的兽医协议类型。食品和农业部门尤其受到英国脱离单一市场的影响。通过将农业和渔业产品贸易的边境管制降到最低，双方在经济和政治上都将获得显著的利益。为整个英国制定一个共同的卫生与植物卫生（SPS）法规框架，也将大幅减少北爱尔兰与英国其他地区之间贸易的边境管制需求。

然而，兽医协议只有在英国愿意承诺保持与欧盟的监管一致时才能实现这些目标。欧盟与新西兰等第三国达成的这种协议，对取消边境管制作用不大，也不太可能符合欧盟的经济利益。这意味着，互利的协议很可能接近欧盟与瑞士达成的协议，而该协议目前正在更新中。

欧盟还将受益于贸易监管障碍的消除，因此不太可能反对一项为农业和渔业部门提供接近单一市场待遇的协议。此外，与瑞士或欧洲经济区的协定不同，TCA 规定了农产品和鱼类的免税准入。这将证明向英国提供与瑞士和挪威在这一领域相同的待遇是合理的，即使英国没有承诺自由流动。

欧盟将需要获得谈判授权，因此，在启动谈判之前就谈判参数达成良好共识至关重要。这些讨论尤其需要考虑协议的范围、监管调整的程度以及与 TCA 法律框架的关系。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为了完全取消海关管制，需要在一段时间内保持一致，而且不仅应涉及主要立法，还应涉及委员会通过的次级立法，以及关于检查从第三国进口的决定。在这三个层面上偏离一致，可能需要在边境保持一定程度的检查。

主要的制度问题将是欧盟法院（CJEU）在兽医协议争议中的作用。TCA 争议解决程序以设立仲裁庭为基础。欧盟可能会坚持认为，如果争议引发与欧盟法律解释有关的问题，仲裁庭应暂停程序，并将该事项提交欧盟法院。这一程序已经在英国脱欧协议中存在，尤其是涉及欧盟法律适用的领域，特别是在温莎框架下，北爱尔兰需要与欧盟法律保持一致。因此，没有理由认为将这一程序适用于整个英国会构成主权的侵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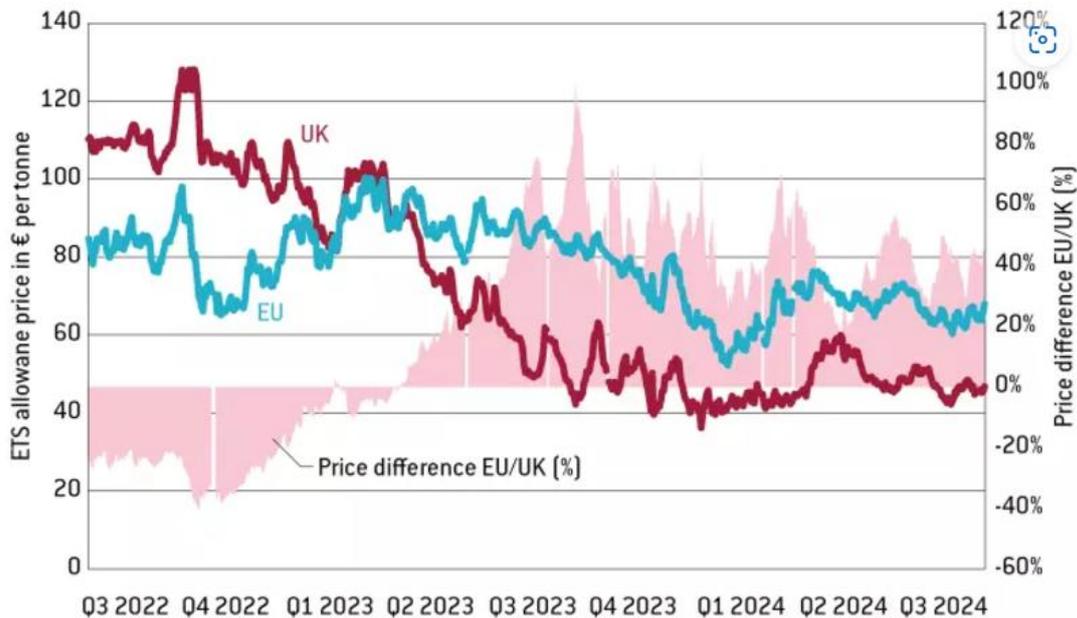
还有两个政治问题需要回答。承诺与欧盟法规保持一致可能会引发美国或加拿大的反对，因为它们可能要求改变当前英国的食品安全要求。因此，英国需要做出政治选择。从经济和公众舆论角度来看，似乎与欧盟达成兽医协议比为换取非常不确定且有限的经济利益而改变敏感领域的法规更容易获得支持。第二个问题是与渔业谈判的联系。无论欧盟谈判授权中是否明确规定了这一点，这都是需要双方预期和管理的政治现实。

4.2 碳定价机制

欧盟和英国都认为自己是气候领导者，并通过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承诺，可以在 2050 年前实现碳中和。尽管 TCA 鼓励将各自的排放交易计划（ETS）联系起来，但在实践中，碳价格差异很大（图 2）。这种价格差异意味着，欧

盟和英国引入边境碳收费可能会对贸易产生重大影响，特别是对北爱尔兰和英国之间的贸易以及电力贸易。

图 2: 欧盟和英国碳价格



资料来源: Bruegel 基于 Statista 数据。

由于欧盟将从 2026 年 1 月 1 日起全面实施其碳边境调节机制 (CBAM, 欧盟条例 (EU) 2023/956), 并开始征收税费, 因此迫切需要启动讨论, 以确定英国排放交易体系 (UK ETS) 需要做出哪些调整, 以便与欧盟排放交易体系 (EU ETS) 对接, 从而避免对欧盟与英国之间的贸易征收 CBAM 税费。CBAM 是欧盟用来平衡国内生产和进口的能源密集型商品碳价的机制。

人们经常提到, 与瑞士的 ETS 联系谈判花了 10 年时间, 但这是由于更广泛的双边关系中的政治不利发展, 以及瑞士需要将其 ETS 扩展到航空业。在双边关系改善以及与 ETS 在范围和设计上相似的背景下, 没有理由不加快欧盟-英国联动协议的谈判。如果谈判在 2025 年底前结束, 那么英国有可能在协议批准之前获得对 CBAM 的有限期豁免。

主要问题是英国 ETS 需要做出哪些改变, 以避免显著的价格差异。欧盟-瑞士协议的附件规定了需要满足的基本标准, 以便瑞士和欧盟排放交易计划具有类似的目标水平和类似的设计。因此, 这些附件可以为技术讨论提供一个很好的参考点, 为欧盟-英国联系协议的谈判做准备。表面上, 最显著的区别是, 与欧盟不同, 英国没有制定逐步取消免费碳排放配额的时间表。这样做对于系统的连接和英国能够应用与世贸组织兼容的 CBAM 都至关重要。虽然欧盟与英国的 ETS 应该具有相同的范围, 但似乎没有理由要求英国也实施欧盟的 ETS2 (该系统将在 2027 年全面实施, 并将对用于建筑和运输的燃料排放进行定价)。ETS2 将仍然是一个独立于原始 ETS 的市场。

除了 ETS 连接外，还有强烈的理由要求欧盟和英国至少在它们的 CBAM 方面进行协调，特别是对于那些监管差异会增加第三国对欧盟或英国出口负担的方面，或者会导致贸易偏移的风险。这尤其适用于行政要求，例如碳排放核算的方法或默认值的应用。英国尚未决定其 CBAM 的具体特征，而欧盟委员会仍需通过一系列实施性法案，才能开始征收进口费用。

与英国就 CBAM 协调展开讨论时，应该采取开放的态度，因为双方都面临如何确保有效实施边境碳措施，同时减少过度的行政负担或对最不发达国家贸易的负面影响的挑战。如第 3.2 节所讨论的，达成连接协议也可以为加强与其他国家在碳定价机制互操作性以及更广泛的贸易与气候议程上的对话提供良好基础。

4.3 改善 TCA 流动性承诺

在英国新政府的领导下，欧盟-英国的关系重置在与流动性有关的问题上没有一个良好的开端。欧盟要求达成青年流动协议，尽管这一要求有时被误解为与移民和自由流动原则相关。欧盟委员会提出的协议方案还包括一些英国难以接受的内容。与此同时，英国确定了两个优先事项——巡演艺术家的流动性和职业资格的互认——这两者要么在技术上困难，要么在短期内难以实现。同样，欧盟委员会也因正式理由拒绝了英国关于巡演艺术家的请求，认为满足这一请求会要求对 TCA 做出变更。这些沟通失败反映了缺乏协调的公共立场和不兼容授权的风险。

谈判达成欧盟-英国青年流动计划的协议已经成为重设的一个门槛问题。尽管这并不构成一项贸易协定，但如果不能启动关于青年流动的谈判，就有可能破坏关于贸易议程的谈判。因此，双方迫切需要进行讨论，以检验各自的灵活性。这个选项是探讨是否可以通过 TCA 的补充协议，不仅涵盖青年流动性，还包括促进文化交流的内容。这可能有助于解决至少关于英国要求的巡演艺术家流动性的签证问题，并强化协议的双赢性，体现双方的优先事项。它也可能是避免在 TCA 服务章节中包括文化相关活动承诺的方式。

无论青年流动和巡回艺术家的前进方向是什么，值得注意的是，2026 年对 TCA 的审查可以考虑改进服务承诺。因此，审查可以超越实施问题——根据 TCA 下设的国内咨询小组和商业组织的建议，审查可以推动达成互利的承诺包，以促进专业人员流动，尤其是在双方加强边境管制的情况下，关于商业联系中断的担忧可能增加。欧盟和英国还可能希望更新 TCA 的数字章节，以反映最近与日本和新加坡达成的数字协议。

关于职业资格互认，由于某些可能希望促进流动性的职业尚未在欧盟内部实施自动互认，短期内可能很难取得太大进展。未来，随着单一市场的进一步深化，可能会创造更多机会。然而，双方可以在协调领域咨询各自的专业团体，

以确定是否有共同利益来制定相互承认的协议。双方还可以确定是否有可能解决建筑师互认协议中的悬而未决问题。

本政策简报中讨论的协议可以由 TCA 范围之外的其他倡议补充。特别是，英国可以考虑加入修订后的泛欧地中海规则（PEM）规则原产地协定，这将使得通过与其他协定签署方的累积规则促进价值链整合成为可能。此举应在与欧盟事先讨论，达成关于现代化 PEM 规则与 TCA 规则原产地之间关系的共识。一个选项可能是两套规则并行适用，允许运营商选择依赖其中一套规则。关于规则原产地的讨论也可能涉及 2027 年 TCA 要求电池和车辆本地含量提高至 55% 的截止日期，是否能满足或应当调整的程度。

5. 同意强化监管合作的指导原则

上一节中讨论的协议将促进贸易并防止出现新的贸易障碍但这些协议难以被视为具有变革性的，也不会对英国经济的增长前景产生重大影响，更不会对欧盟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对英国而言，与欧盟建立更紧密贸易关系的主要潜在经济价值，将是通过保证英国与欧盟在监管方面保持紧密一致，并将欧洲价值链中的贸易摩擦降至最低，从而减少投资的不确定性。

因此，无论与欧盟达成什么协议，英国单方面采纳一项政策，承诺通过至少在维护一体化价值链的关键领域采纳欧盟的法规来消除被动的监管差异，是有意义的（英国贸易和商业委员会，2023；Reland，2024）。虽然这本身并不能保证更好地进入欧盟市场，但英国企业将受益于更大的监管确定性和公平的竞争环境，因为单一的监管制度将适用于在英国销售的所有商品。监管合作还将进一步限制温莎框架下的紧张关系或与欧盟的公平竞争争议的范围。

在考虑这一政策对英国的影响时，区分与欧盟监管发展有关的三种情况可能是有益的：

1. 欧盟在英国脱欧之前已建立的先进监管制度。作为欧盟成员国，英国完全参与了这些法规的制定；维持监管一致性通常对避免供应链中断至关重要。

2. 欧盟自英国脱欧以来引入的新主要立法。实施欧洲绿色协议或监管数字经济的新欧盟立法尤其如此。由于欧盟法规的引力效应，英国采用与欧盟接近的法规通常是有意义的。但是，与前一种情况不同，这需要更仔细的成本效益分析，而且无论如何，英国在政治上很难在不进行监管对话的情况下与欧盟法规保持一致。

3. 英国拥有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行业，并且可能希望保持一定程度的监管自主性。这类情况主要出现在金融服务领域，因为该领域的许多法规本身就是国际性的。

因此，英国可能会对一项协议感兴趣，该协议不仅在卫生和植物检疫措施方面维持单一市场待遇，还希望在更广泛的商品贸易领域实现类似待遇。然而，英国新政府一直谨慎避免提出这一要求，预期欧盟会对此做出负面反应，因为

欧盟已有明确的红线，禁止“挑挑拣拣”的选择性接纳。在任何情况下，基于本政策简报前文的讨论，欧盟不太可能考虑在卫生和植物检疫措施之外，仅针对某些有限工业部门达成单一市场协议。

然而，欧盟可能会考虑加强监管合作，前提是这有助于保持英国与欧盟监管模式的紧密联系。除了英国案例外，随着欧盟在越来越多影响其辖区外行为的领域加强监管，它需要为更多的监管合作投入更多资源。CBAM 是欧盟规则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它将受益于与第三国合作的更强有力的规定。欧盟-英国关于新监管举措的对话可以帮助确定如何将外部因素最好地纳入新的立法。

因此，有充分的经济理由发展一个促进监管一致性，以及更广泛地推动监管兼容性和良好监管实践的监管合作框架。该框架不具备法律约束力，但可以基于一套在 TCA 伙伴理事会达成共识的原则。这些指导原则可以包括四个要素：

5.1 保持单一市场货物法规的最大一致性

英国可以表明其继续与欧盟在商品贸易领域保持法规一致性的意图，特别是在英国脱欧时已经与欧盟法规保持一致的领域。为了促进这一进程，欧盟委员会可以提前提供关于规划中的监管发展信息，并促进英国监管机构与欧盟相关监管机构的联系（这些监管发展大多可能以欧盟委员会实施或委托的法规形式进行）。英国将在完成监管调整程序后通知欧盟委员会。这将建立一个信息交流的过程，但该流程将不如可能在兽医协议中涉及的英国参与决策制定的角色那样正式。在这一经验的基础上，英国和欧盟还可以考虑达成一项协议，规定在法规一致的部门相互承认合格评定或其他贸易便利化措施。

5.2 促进监管机构之间就重要的新监管举措进行对话

双方可同意就可能对双边贸易产生重大影响的新立法倡议进行对话。监管对话可以从影响评估阶段开始，并在提出立法提案后继续进行。他们可以帮助确定英国可能希望在多大程度上采用与欧盟类似的法规，或者，如果这不可行，如何减少贸易摩擦并保持最大程度的监管兼容性。

这种类型的对话可能与欧洲绿色协议立法或新数字要求的实施（包括人工智能）特别相关。虽然对话可能不会对欧盟决策者的监管选择产生重大影响，但一旦立法获得通过，对话可能有助于在立法中纳入促进合作的规定。它还可以使英国在政治上更容易决定是否采用兼容的立法。

5.3 在国际监管论坛中开展合作

在金融服务和若干商品贸易领域，双方采用的法规通常源自国际论坛。由于英国标准协会一直是欧洲标准化机构的成员，因此在国际标准化活动中已经有了密切的合作。随着欧盟和英国的监管体系保持紧密对接，双方在国际监管机构中强化合作的空间也将更大。

5.4 透明度和利益相关方的参与

监管合作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透明度和对利益相关方请求的开放性。尤其是在双方国内咨询小组提出监管合作活动建议时，透明度尤为重要。根据 TCA 协议下的监管合作委员会，可以与国内咨询小组会面，回应关于新的监管合作活动的建议。然后，伙伴关系理事会可以在其议程上列入一个常设项目，供部长级官员评估在监管合作活动方面取得的进展。除了具体的监管合作活动外，监管合作委员会还可以提供机会，就如何确保监管有利于竞争并以透明的方式制定交换意见。

如果有政治意愿，执行上述原则的主要挑战将是需要投入资源。在某种程度上，英国与欧盟之间的监管关系可以比作加拿大与美国之间的关系。为了管理监管接口，美国和加拿大成立了监管合作理事会。不可避免的是，为促成合作而投入的大量时间和资源都来自加拿大方面。与其创建一个新的机构结构，更务实的做法是依赖 TCA 现有的机构结构。然而，为了确保有效性，英国需要在国内建立一个系统，追踪欧盟的监管发展，并为监管合作活动提供反馈。

六、结论

这份政策简报的建议旨在主要为欧盟-英国贸易关系注入新动力，重点在于实现互利共赢。在地缘政治动荡的时期，加强欧盟与英国的合作有助于加强对基于规则的贸易体系的支持。尽管所建议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可能产生的经济影响有限，但它们将有助于重建相互信任，并采取一些有意义的贸易便利化措施。它们还可能为进一步的贸易便利化协议打开大门，如关于相互承认合格评定的协议或与印度-太平洋国家达成的对角累积协议。尽管强化的监管合作框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如果它能阻止被动监管差异的过程，并促成真正努力保持监管制度的一致性，那么它可能会产生更大的经济影响。

本文原题为“A trade policy framework for the European Union-United Kingdom reset”。本文作者 Ignacio García Bercero 于 2024 年 9 月作为非常驻研究员加入 Bruegel。本文于 2024 年 11 月刊于 Bruegel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特朗普宣布征收关税，对欧盟构成挑战

Julian Hinz / 文 张丝雨 / 编译

导读：特朗普宣布对墨西哥、加拿大和中国征收关税表明美国正在坚定推行保护主义政策，甚至可能损害自身利益。这一举措对欧盟构成了警示，欧盟需为可能针对自身的美国保护主义政策做好准备。欧盟应通过与美国达成特定领域的贸易协议来减少短期经济损失，同时多元化贸易关系，增强军事自卫能力，以提高谈判地位。维护全球贸易秩序至关重要，因为世贸组织的崩溃将对欧盟经济造成比美国关税更为严重的影响。编译如下：

唐纳德·特朗普最近宣布，他将向墨西哥、加拿大和中国征收关税，这表明他坚定不移地推行保护主义政策，即使这可能会损害美国自身的利益。尤其令人担忧的是，他针对墨西哥和加拿大采取了这一举措，而这两个国家是美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特朗普在其第一个总统任期内还与这两个国家达成了贸易协议。对于欧盟而言，这一举动清楚地表明，欧盟也必须为美国可能针对欧盟的保护主义贸易政策做好准备，并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

美国是欧盟经济最重要的双边贸易伙伴之一。关税或其他保护主义措施将直接影响欧洲的出口。然而，更为严重的后果是，世贸组织 (WTO) 的削弱和全球贸易秩序分裂为对立的贸易集团，这将对欧盟的长期利益造成更大损害。

为了避免事态升级，欧盟可以向美国提出一项仅限于某些特定领域的贸易协议。这类协议可以在短期内减少双方的经济损失，并增强跨大西洋关系的信任。同时，欧盟应多元化其贸易关系，并迅速提升在没有美国帮助的情况下独立防卫的能力，以增强其谈判地位。

维护全球贸易秩序也必须成为欧盟的首要任务。世贸组织的崩溃对欧盟的经济打击将远大于美国的关税。特朗普的这一声明凸显了欧盟采取战略性行动和统一立场的必要性，确保所有成员国以一致的声音发声。

本文原题为 "Trump's announcement of tariffs poses a challenge for the EU"。作者为 Julian Hinz。Julian Hinz 是比勒费尔德大学的国际经济学教授，也是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贸易政策研究中心的负责人。此前，他曾担任比勒费尔德大学的助理教授、基尔研究所贸易政策特别工作组的负责人，并在杜塞尔多夫大学的杜塞尔多夫竞争经济研究所担任客座助理教授，还曾是基尔研究所的博士后研究员。他具有巴黎经济学院和巴黎第一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本文于 2024 年 11 月刊于 KIEL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世界贸易体系能否经受住唐纳德·特朗普的考验？

Alan Wm. Wolff/文 廖世伟/编译

导读：世界贸易体系面临的最突出的新挑战是，最近再次当选的美国总统明确表示打算对所有进口产品征收 10% 或 20% 的关税，但来自中国的进口产品将被征收 60% 的关税。目前，近 200 个国家的贸易部门正在进行对话：他们是否应该提供利诱，让美国总统让步？他们应该报复吗？如果无法达成协议，一些国家将会决定他们别无选择，只能采取行动。编译如下：

世界贸易体系面临的最突出的新挑战是，最近再次当选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明确表示打算对所有进口产品征收 10% 或 20% 的关税，对来自中国的进口产品征收 60% 的关税。目前，近 200 个国家的贸易部门正在进行对话：他们是否应该提供利诱，让美国总统让步？他们应该报复吗？如果无法达成协议，一些国家将会决定他们别无选择，只能采取行动。

中国出口是否会转向第三国市场，进而损害这些国家的经济利益？美国是否会进一步采取行动，对第三国出口到美国市场的产品中的中国成分采取限制性规定？

从全球经济的角度来看，首要挑战是世界贸易组织（WTO）成员要抵制基于规则的开放国际贸易体系逐步瓦解的趋势。他们能否抵挡住更广泛地保护本国经济的诱惑？

能否将贸易体系受到的损害控制在有限范围内？

即使没有唐纳德·特朗普的当选，贸易体系也存在严重问题。世贸组织缺乏领导力。至少从奥巴马政府的某个时候开始，美国就不再扮演这一角色，而且看起来也没有回归的打算。欧盟远没有人们所希望的那么有效。中国并未加大对全球贸易体系的投入。这一空缺在一定程度上被日本、澳大利亚和新加坡等中等经济体填补，但这远远不够。

世贸组织成员在多边基础上进一步实现贸易自由化的意愿已基本消失。

此外，还存在严重的制度问题。在 30 年前结束的乌拉圭回合贸易谈判中展现出的成功合作水平，之后再未达到过。在过去三十年中，从未达成过类似于农业协议、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与产品标准相关）、服务贸易协议以及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等具有广泛性质的协议。世贸组织在谈判新协定方面所作的最大努力包括取消大多数世界贸易信息技术产品的关税和缔结一项贸易便利化协定。但大多数情况下，世贸组织遵循协商一致的原则，这导致任何协议都无法正式获得世贸组织成员的通过。

如果这次对话发生在一个月前，我们就会讨论世贸组织是否可以在短期内再次制定适用于所有国家的具有约束力的争端解决方案，以执行其协议。现在答案已经很明显——2029 年之前不可能。

在不同的情况下，我们会讨论秘书处和总干事是否应该在管理贸易体系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类似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姊妹国际经济组织中高管所发挥的作用。尽管所有世贸组织成员一再承诺，但从未尝试过这类影响深远的改革，现在显然还很遥远。

世界面临着一系列需要采取行动的新挑战。其中包括气候变化、其他紧迫的环境问题、促进更大的公平性、为蓬勃发展的数字经济制定规则、尽可能补救粮食不安全问题等等。

前景是这些挑战将继续得不到充分的应对。

但情况不必如此。

我们为什么要在乎世贸组织的存在？

自多边贸易体系建立以来的过去 80 年里，世界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全面繁荣。世界贸易的 75% 左右都在其规则下进行。亚当·斯密（Adam Smith）教导我们要设想一个尽可能没有障碍的广阔市场，这样所有人类的生产努力都将被允许在其最擅长的领域实现专业化，提高效率。这是世界贸易体系，关贸总协定和世贸组织所做的。

- 今天的世界贸易量大约是关贸总协定早期水平的 44 倍（从 1950 年到 2023 年增长了 4400%）。
- 今天的世界贸易价值已经从 1950 年的水平增长了近 370 倍。
- 截至 2023 年，世界贸易量和贸易价值自 1995 年世贸组织成立以来分别平均增长了 4% 和 6%。

目前世界上最惠国实施的关税平均为 9%。对发达国家来说，工业产品的关税约为 3%。

为了实现全球繁荣，不仅必须降低壁垒，还必须达成一致的规则。世贸组织的规则首次体现在 1947 年的关贸总协定中，要求用非歧视取代二战前的歧视性贸易安排。一项庄严的契约承诺要求世贸组织成员不将关税提高到其承诺的水平之上。进口商品一旦进入市场，即应给予国民待遇。而且要有透明度，以便所有人都能了解适用于贸易的措施。

提供了解决争端的手段。贸易要受一致同意的规则的管辖，而不是经济力量的管辖。

在贸易自由化和世贸组织成员通过贸易补救措施解决贸易损害的能力之间取得平衡。

对富国以牺牲穷国为代价补贴其生产的行为将有所限制。

应该具有普遍性，以便所有国家都能通过加入贸易体系而获益。又有 22 个欠发达和最不发达的国家寻求加入世贸组织现有的 166 个成员国，这证明了世贸组织的价值。

这是一个在很大程度上通过美国的努力构建起来的世界贸易经济。世界贸易体系在以不流血的胜利结束冷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在很大程度上阻止了法西斯国家的崛起。它是一个为支持和平而构建的系统。

需要采取哪些步骤来维护和加强世界贸易体系？

世贸组织的其他成员是否会站出来维护和加强世界贸易体系？在没有美国作为合作伙伴的情况下，欧盟是否会采取行动发挥领导作用，这将需要大幅提高其对自由世界秩序的投资水平？中国是否会放弃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转而强调消费？中国是否会像 2001 年加入世贸组织时承诺的那样，允许市场力量决定竞争结果？中等水平的经济体和志同道合的国家，是否会与其他国家，特别是欧盟联合起来，使世贸组织建立在更坚实的基础上，使其有效？

需要进行制度变革。必须确保非参与者不能再阻止世贸组织内部愿意推进的成员之间达成的协议。区域和双边协定必须根据其是否在贸易转移不超过贸易创造的程度上使非参与者受益来判断。争端解决机制的设计必须让所有世贸组织成员再次同意遵守具有约束力的结果。必须在贸易自由化承诺与补救贸易损害所需的减损之间恢复平衡。新的世贸组织必须有一个可行的国家安全例外，确保这些措施将是例外的，而且绝不是无代价的，从而保持让步的平衡。必须赢得和恢复对制度公平和平衡的信任。

在未来四年内，甚至在此后的几年内，这些改善都不会实现。这需要一群有志之士共同努力，维护世界贸易体系并对其进行改进，保留其原有价值，同时增添新的价值——公平、可持续性、应对气候变化、解决粮食不安全问题，以及为应对未来大流行病做好准备，通过贸易体系为解决方案提供支持。下一个时期不应采取守势，而应具有远见和承诺——这种远见创造了欧洲联盟、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协定，以及最初的关贸总协定和后来的世贸组织。

这是我們所需要的。如果有必要，即使在短期内美国不参与，这也是可以实现的。

然而，这将是在美国贸易政策发生逆转的背景下实现的，这一逆转与从富兰克林·罗斯福到巴拉克·奥巴马这十三位总统期间的政策截然不同。

在这一时期，全球经济前景可能不会那么光明，贸易限制可能会变得更加普遍。在一个远不那么繁荣的世界里，美国经济的表现将不会那么好。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世界各国将迎接这一挑战。与牛顿物理学一样，经济学也有一条定律。它致力于让个人做出合理的经济决策，并让政府允许他们这样做。一个更加完善的世界贸易体系最终将得以实现，并带来诸多益处。

本文原题为“Can the world trading system survive Donald Trump?”。本文作者 Alan Wm. Wolff 是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本文于 2024 年 11 月刊于 PIIE。[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美国正在经历制造业复兴，这将促进中产阶级的发展？

Robert Z. Lawrence/文 熊春婷/编译

导读：尽管拜登计划将刺激非传统地区制造业就业的快速增长，但并没有带来美国制造业的广泛复兴，未来也不太可能实现。随着拜登项目拨款的发放，可能会有更多的公告。然而，更新数据的结果不太可能改变这一分析的核心结论。即使额外的公告将制造业就业人数估计再增加 50%，制造业在美国整体就业中的作用也将非常有限。为了改善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工人和落后社区的前景，需要更多的政策，其关注范围远远超出制造业。编译如下：

多年来，美国制造业就业比例下降的历史趋势一直困扰着政治家和政策制定者。在 2019 年新冠疫情加剧了经济衰退之后，拜登于 2020 年当选美国总统并且将其经济政策的目标定为“更好地重建经济”，并通过振兴工业来恢复中产阶级就业，特别是在中西部地区，他将其称为“自下而上和中部向外的经济增长”。经济民族主义目标强化了对制造业的重视，即将本应送往海外的工作岗位送回美国——正如政府所宣称的“在美国制造和建设”。

这一重点体现在拜登总统的计划中对美国制造业的特别激励措施上。他提高了美国政府采购的“本土化比例”门槛。《基础设施投资与就业法案》（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and Jobs Act）（也称为《两党基础设施法案》）要求其项目中使用的所有钢铁、制成品和建筑材料都必须在美国制造。《芯片与科学法案》（Chips and Science Act）为在美国制造半导体提供 240 亿美元的税收抵免。另外还有 390 亿美元用于激励在美国投资芯片设施和设备。《通货膨胀削减法案》（IRA）为清洁能源投资和生产以及购买在北美组装的电动汽车（EV）提供税收抵免，这些电动汽车的电池使用在美国或与美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开采和提炼的矿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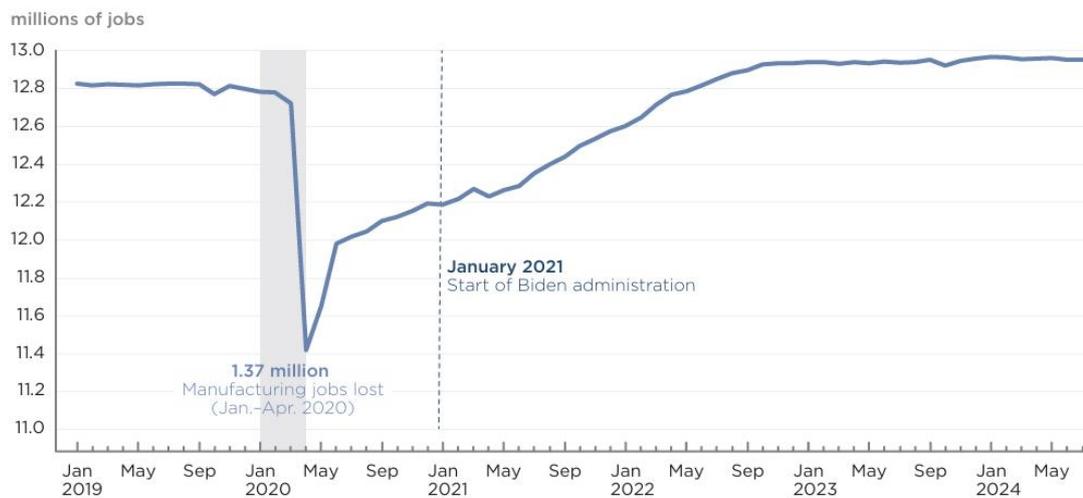
近年来，政府的政策扩大了制造业边际就业的基础。但是，尽管这些政策很有吸引力，但它们不太可能成为实现中产阶级增长的关键，因为制造业不再像过去那样为没有大学学位的工人提供加入中产阶级的机会。不过制造业仍然可以帮助实现其他目标，比如为数字革命提供硬件；保障国家安全的武器；以及对脱碳至关重要的电动汽车、风力涡轮机和太阳能电池板。但目前该行业规模太小，无法在重振美国萧条地区和为美国工人提供重要机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在美国，创造制造业就业机会的吸引力不太可能在政治上消退。但美国并不是唯一一个经历制造业就业长期下降趋势的国家。由于自动化程度的提高和技术变革的增加以及需求向服务业的转移，在所有高收入经济体和许多新兴市场经济体中，制造业在就业和产出中所占的份额不断下降。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德国、韩国、日本、新加坡和中国等国家，制造业就业份额的下降趋势也很明显。尽管他们在制成品方面存在大量贸易顺差（劳伦斯 2020，2024）。

1. 美国制造业复兴了吗？

媒体和拜登政府已经预告了美国制造业的复苏。以 2023 年 8 月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为例，在《爱尔兰共和军法案》（IRA）和《芯片法案》（CHIPS Act）通过后的一年里，美国宣布了 2240 亿美元的清洁技术和半导体项目，每个项目的价值都超过 1 亿美元。在接下来的一个月，《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的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在一篇名为《美国复兴已近在眼前》的专栏文章中写道，“一场火热的制造业繁荣。”他的同事、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认为，新的产业政策已经产生了“一股巨大的制造业私人投资浪潮，尽管联邦政府的资金还很少分配。”

图 1：美国制造业就业，1 月 2019-2024 年 7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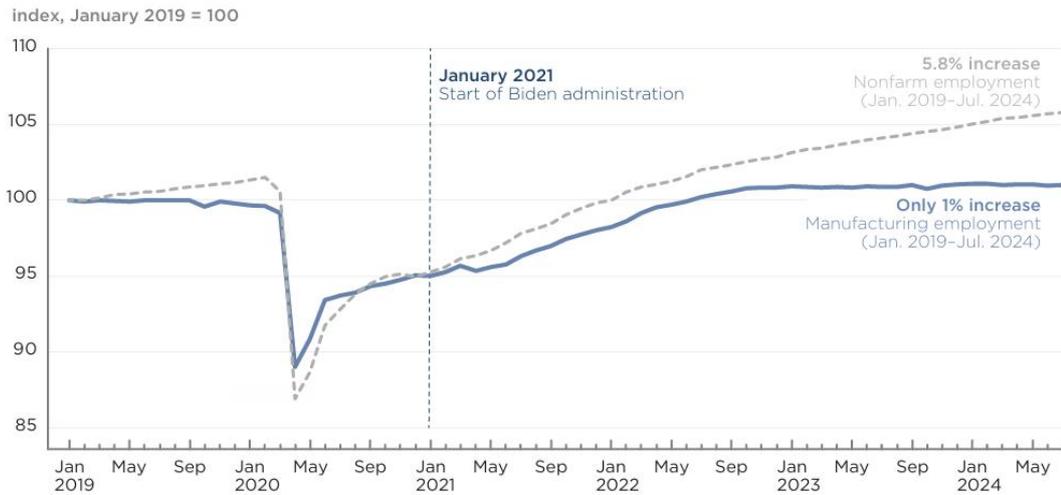
Source: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 Federal Reserve Economic Data (FRED), <https://fred.stlouisfed.org/series/MANEMP>.

白宫也大肆宣扬美国制造业的复兴。2023 年 3 月，它吹嘘说自拜登总统上任以来，制造业增加了 80 多万个就业岗位，“是历届总统中最多的”。2023 年 12 月，美国国家经济顾问莱尔·布雷纳德（Lael Brainard）认为，“两党共同通过的《基础设施法》《降低通货膨胀法》《芯片和科学法》正在推动美国制造业的反弹。”

事实上，制造业就业的增长比这些数据所显示的要弱得多。2020 年中期之后的制造业就业增长需要在新冠肺炎大流行所带来的不寻常的美国商业周期背景下进行判断。2020 年 1 月至 4 月，制造业就业岗位锐减 137 万个（图 1）。政府提到的就业增长只是从这一异常下降中的反弹，而这一下降在拜登总统上任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在恢复到之前的水平后，制造业就业增长速度明显放缓，在 2022 年 9 月至 2024 年 7 月期间，制造业就业几乎没有增长。

2024 年 7 月，制造业就业人数仅比 1 月份 2019 高出 1.0%（图 2）。相比之下，同期非农就业增长了 5.8%。结果是制造业就业人数占非农就业人数的比例稳步下降（图 3）。截至 2024 年 7 月，数据显示制造业就业没有复苏。就业只是恢复到 2019 水平，然后停滞不前。

图 2：美国制造业和非农就业，1月 2019-2024 年 7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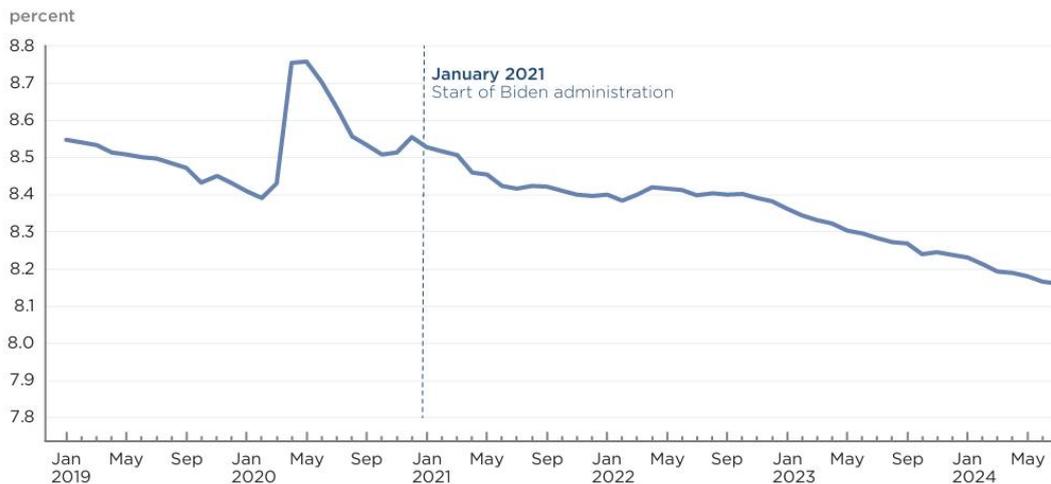


Source: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 Federal Reserve Economic Data (FRED), <https://fred.stlouisfed.org/series/MANEMP>.

制造业的产出增长也相对缓慢。从 2019 第一季度到 2024 年第一季度，实际制造业产出与 GDP 的比率（均以 2017 年美元计算）下降了 5.2%（图 4）。制造业在美国产出扩张中的作用微乎其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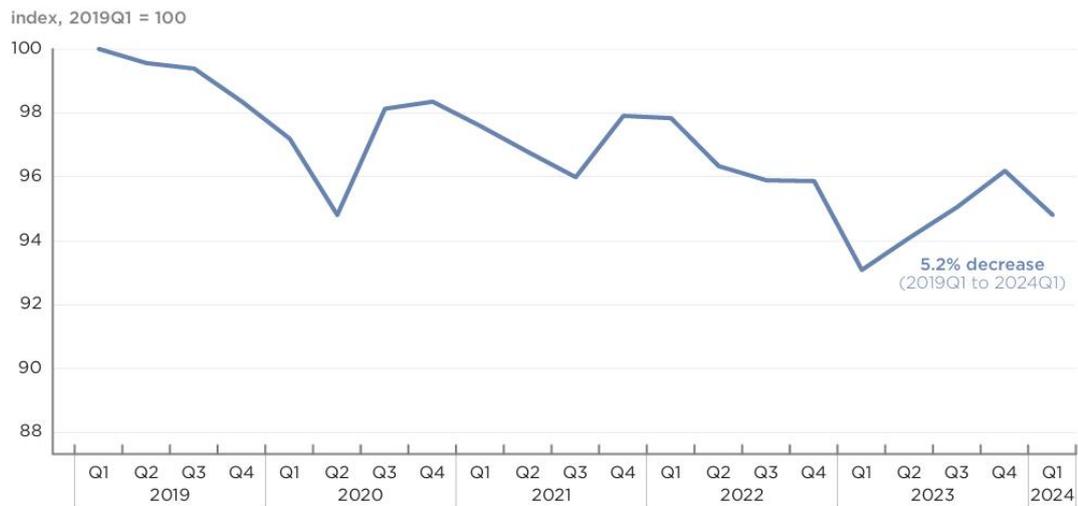
制造业就业增长缓慢，加上该部门产出份额下降，导致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长低于整体经济增速。例如，在 2024 年第二季度，商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比 2017 年同期提高了 12.7%。相比之下，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下降了 2.0%。2017 年至 2022 年（可获得的最新数据），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相对于制造业中使用的所有投入的产出增长的更全面的衡量标准——不到 0.1%。相比之下，在 2010 年之前的几十年里，制造业的生产率增长快于其他经济部门是常态。

图 3：2019 年 1 月至 2024 年 7 月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占非农就业人数的百分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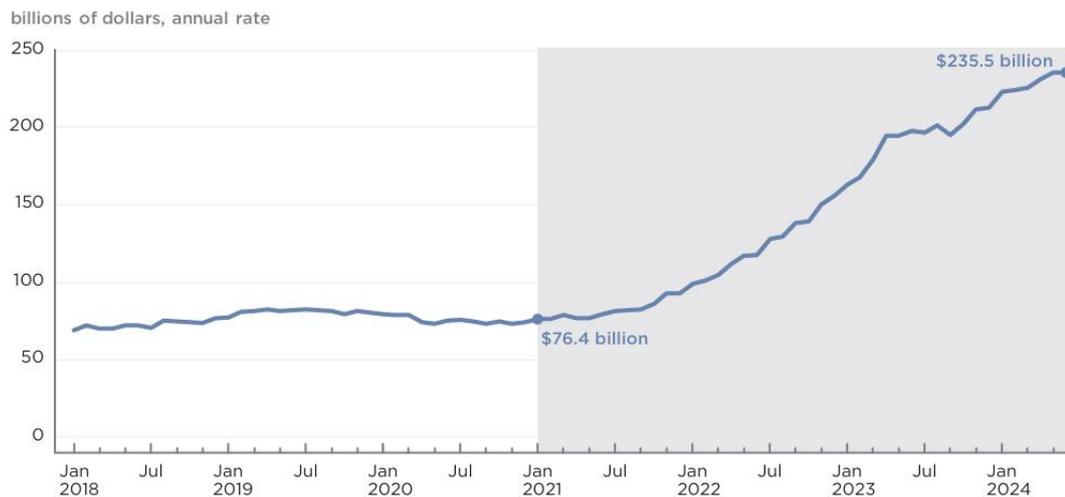
Source: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 Federal Reserve Economic Data (FRED), <https://fred.stlouisfed.org/series/MANEMP>.

图 4：美国实际制造业产出与 GDP 的比率，2019Q1 - 2024Q1



Note: Figures are measured in 2017 chain dollars. Data are seasonally adjusted.
Source: U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Chain-Type Quantity Indexes for Value-Added by Industry.

图 5：2018-24 年美国制造业和建筑业支出



Note: Figures are seasonally adjusted.
Source: US Census Bureau via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 Federal Reserve Economic Data (FRED).

总之，在拜登执政的头三年半时间里，制造业没有出现复兴。新冠疫情复苏后就业增长停滞，制造业在就业和产出中的份额下降，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没有上升。

2.制造业会复兴吗？

这种分析可能过于专注回顾过去。更多的制造业就业机会即将到来：制造业建筑支出激增，年增长量从 2021 年 1 月的 764 亿美元增至 2024 年 6 月的 2355 亿美元（图 5）。建筑业激增的主要来源是计算机、电子和电气制造业。

与这种更为乐观的说法相一致的是，白宫一直在关注私营企业宣布的清洁技术和高科技领域的投资计划，拜登政府计划也强调了这一点。到 2024 年 7 月，自拜登总统上任以来，这些公告的累计总额已达 8978 亿美元，其中 7380 亿美元用于制造业，1600 亿美元用于清洁电力。这个数字包括 3952 亿美元的半导

体、1765 亿美元的电动汽车和电池，1599 亿美元的清洁能源，807 亿美元的清洁能源制造业，439 亿美元的重型制造业，以及 416 亿美元的生物制造。

并非所有这些投资都归因于拜登的计划，因为有些投资可能是在不考虑这些计划的情况下进行的。尽管如此，公司通过联邦政府和各州的计划拨款和税收抵免获得或预期获得的利益，无疑占了很大的份额。

白宫已经按州提供了这些投资的详细数据。这些数据可用于为这些投资可能产生的额外的制造业就业机会的规模和位置提供非常粗略的初步估计。一个简单的方法是假设（a）宣布的投资代表了制造业净资本存量的增加，并以与 2022 年平均制造业劳动力相匹配的速度增加就业，（b）每个州的就业份额将与其在已宣布的投资总价值中的份额成正比例。

在进行本文分析时，对制造业净资本存量的最新估计是针对 2022 年的，因此本分析是使用 2022 年的数据进行预测。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的数据，按 2022 年的价格计算，2022 年制造业的净资本存量为 5.479 万亿美元。不包括代表公用事业投资的清洁能源，截至 2024 年 7 月，已宣布的制造业投资 7301 亿美元将相当于 2022 年制造业资本存量的 13.3%。2022 年，制造业就业人数约为 1280 万人。假设制造业的资本-劳动力比率不变，这些投资将使制造业工人的需求增加 $0.133 \times 12.8 = 170$ 万。同样的方法表明，生产清洁能源的公用事业将需要额外的 25200 名工人。在 2000 年至 2023 年期间，美国制造业的就业人数从 1726.5 万下降到 1294.3 万，减少了 432.3 万人。新增的 170 万个制造业工作岗位相当于 2000 年至 2022 年期间制造业工作岗位流失的 39.3%——但这一数字夸大了净影响。因为它忽略了其他行业的下降。

这种方法显然是泛泛而谈。这些估计值的目的是提供投资对就业的潜在影响的数量级，而不是精确的估计数。事实上，资本-劳动力比率因行业、企业和国家而异，由于投资需要几年时间才能完成，所以资本-劳动比率很可能会发生变化。

这样做的目的是抓住这些投资项目实施后对制造业就业的长期增加。这些估计数不包括在规划、建造和装备设施方面创造的就业机会。这些估计还不包括非制造业部门产生的长期增值和就业。

应该强调的是，这些估计只考虑了与投资相关的就业的积极预期增加，而忽略了可能抵消这一增长的因素，如与依赖化石燃料的制造业生产关闭相关的就业下降，电动汽车淘汰的汽车零部件生产下降，现有制造业资产的折旧，自动化可能带来的生产率增长、其他制造业的下降以及 2022 年以来的价格和就业变化。

此外，由于公司计划的变化，一些投资实际上可能不会进行。执行困难，如无法获得许可证、联邦和州对所宣布的投资的拨款是基于和/或足够熟练的工

人；以及不断变化的需求条件。然而，由于拨款仍在进行中，这些表格也有可能低估了这些项目最终刺激的投资的最终规模。

鉴于经济接近可持续的充分就业（2024年8月失业率约为4%），在这些业务中工作的大多数工人目前很可能在从事其他工作，而不是失业或退出劳动力市场。这意味着，这些估计数应被视为描述就业的行业和地理构成的潜在变化，而不是国家层面的总就业增加数。

3.各州的影响

一些州可能会经历制造业就业需求的大幅增长（表1）。制造业就业增长30%或以上的州是亚利桑那州（139.2%的增长）、爱达荷州（79.2%）、西弗吉尼亚州（57.5%）、纽约州（47.8%）、俄勒冈州（47.3%）和新墨西哥州（46.3%）。失业率超过20%的州包括内华达州（28.3%）、路易斯安那州（26.4%）、得克萨斯州（25.7%）和佐治亚州（21.3%）。

表 1：已宣布的投资（截至 2024 年 7 月）对美国各州制造业工资和薪金就业的估计影响

State	Manufacturing employment, 2022 (no. of jobs)	Total employment, 2022 (no. of jobs)	Percent share of employment in the announcements (as of July 2024)	Cumulative share of announcements (percent)	Estimated additional employment due to announced investments (above 2022 levels)		
					Number of jobs	Share of manufacturing employment (percent)	Share of total employment (percent)
1 Arizona	189,823	3,206,670	15.5	15.5	264,179	139.2	8.2
2 Idaho	73,559	865,816	3.4	18.9	58,277	79.2	6.7
3 West Virginia	46,448	709,777	1.6	20.5	26,714	57.5	3.8
4 New York	423,805	9,601,792	11.9	32.4	202,720	47.8	2.1
5 Oregon	192,959	2,008,171	5.4	37.8	91,216	47.3	4.5
6 New Mexico	28,984	878,478	0.8	38.6	13,417	46.3	1.5
7 Nevada	65,454	1,528,778	1.1	39.7	18,501	28.3	1.2
8 Louisiana	134,072	2,001,020	2.1	41.7	35,444	26.4	1.8
9 Texas	924,919	13,887,510	13.9	55.7	237,313	25.7	1.7
10 Georgia	420,508	4,988,559	5.3	61.0	89,742	21.3	1.8
11 North Carolina	474,624	5,011,689	5.4	66.4	92,007	19.4	1.8
12 Utah	150,327	1,759,886	1.5	67.9	26,194	17.4	1.5
13 South Carolina	261,614	2,307,528	2.2	70.2	38,232	14.6	1.7
14 Ohio	686,149	5,632,510	5.8	75.9	98,123	14.3	1.7
15 Kansas	168,944	1,502,382	1.3	77.2	22,375	13.2	1.5
16 Tennessee	367,734	3,305,841	2.8	80.1	48,064	13.1	1.5
17 Kentucky	252,490	2,062,126	1.9	81.9	32,036	12.7	1.6
18 Indiana	543,813	3,281,893	4.0	86.0	68,694	12.6	2.1
19 Michigan	610,763	4,454,417	3.6	89.6	62,119	10.2	1.4
20 North Dakota	27,457	446,727	0.2	89.8	2,739	10.0	0.6
21 Mississippi	148,555	1,226,196	0.8	90.5	12,903	8.7	1.1
22 Colorado	153,262	3,003,053	0.7	91.3	12,110	7.9	0.4
23 Alabama	273,952	2,154,012	1.2	92.5	20,960	7.7	1.0
24 Arkansas	163,242	1,331,331	0.7	93.1	11,299	6.9	0.8
25 South Dakota	45,254	475,287	0.2	93.3	2,914	6.4	0.6

State	Manufacturing employment, 2022 (no. of jobs)	Total employment, 2022 (no. of jobs)	Percent share of employment in the announcements (as of July 2024)	Cumulative share of announcements (percent)	Estimated additional employment due to announced investments (above 2022 levels)		
					Number of jobs	Share of manufacturing employment (percent)	Share of total employment (percent)
26 Wyoming	9,780	290,384	0	93.4	606	6.2	0.2
27 Oklahoma	129,268	1,743,257	0.3	93.7	5,762	4.5	0.3
28 Rhode Island	40,320	511,841	0.1	93.8	1,781	4.4	0.3
29 California	1,329,773	18,814,316	2.9	96.7	50,144	3.8	0.3
30 Illinois	569,256	6,190,308	0.7	97.4	11,693	2.1	0.2
31 Maine	54,598	651,797	0.1	97.5	1,044	1.9	0.2
32 Washington	268,573	3,750,100	0.3	97.8	5,071	1.9	0.1
33 Maryland	111,705	2,823,994	0.1	97.9	2,089	1.9	0.1
34 Virginia	245,025	4,255,727	0.3	98.2	4,429	1.8	0.1
35 New Jersey	250,888	4,307,291	0.3	98.4	4,387	1.7	0.1
36 Massachusetts	238,450	3,779,020	0.2	98.7	4,033	1.7	0.1
37 Vermont	29,035	316,746	0	98.7	438	1.5	0.1
38 Minnesota	324,192	2,992,223	0.2	98.9	3,462	1.1	0.1
39 New Hampshire	69,914	700,357	0	98.9	746	1.1	0.1
40 Pennsylvania	565,320	6,194,150	0.4	99.3	6,013	1.1	0.1
41 Wisconsin	483,506	3,036,037	0.3	99.6	4,807	1.0	0.2
42 Montana	22,035	526,075	0	99.6	210	1.0	0
43 Delaware	26,303	482,138	0	99.6	245	0.9	0.1
44 Nebraska	103,508	1,051,451	0.1	99.7	893	0.9	0.1
45 Florida	409,195	9,798,386	0.2	99.9	3,415	0.8	0
46 Missouri	282,509	2,997,480	0.1	100.0	1,587	0.6	0.1
47 Connecticut	157,295	1,728,113	0	100.0	816	0.5	0
48 Iowa	223,734	1,627,793	0	100.0	0	0	0
Total	12,772,893	152,993,763	100.0		1,701,962	13.3	1.1

Note: Data are based on 48 states. Alaska, Hawaii, and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are excluded. The estimates in this table differ from the announcement employment numbers in table 10.1 in my book (Lawrence 2024) because of different methodologies and data used.
Sources: U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https://www.bea.gov/data/employment/employment-by-state>; White House, Investing in America, <https://www.whitehouse.gov/invest> (accessed August 5, 2024).

这些投资的地点代表了美国制造业在地理上的重新分配，因为就业效应集中在并不专门从事制造业的西部和南部各州。公告中制造业就业增幅最大的 10 个州占 2022 年制造业就业的 19.6%，占美国整体就业的 25.4%（表 2）。

表 2：按国家组分列的已宣布投资对就业的影响（高于 2022 年水平的百分比）

Group	Share of US manufacturing employment, 2022	Share of total US employment, 2022	Share of US manufacturing job losses, 2000-2022	Share of employment from the announcements	Increase in manufacturing employment	Increase in total state employment
Top 10 states	19.6	25.4	15.1	61.0	41.5	2.6
Next 10 states	27.7	19.1	28.7	28.8	13.8	1.6
Rest of states	52.7	55.5	56.1	10.2	3.7	0.3
Total	100.0	100.0	100.0	100.0	13.3	1.1
Rust Belt	27.1	18.4	32.2	14.8	7.3	0.9
States Biden won in 2020	53.6	57.7	63.5	50.2	12.5	0.9
Swing states in 2020	22.0	18.2	24.2	31.6	19.1	1.9

Source: Table 1 and CNN 2020 Presidential Election Results, <https://www.cnn.com/election/2020/results/president>.

新的投资并没有特别集中在制造业工作岗位流失的地方。2000 年至 2022 年期间，美国制造业就业增幅最大的 10 个州仅占美国制造业就业岗位流失的 15.1%。但在这些州，与公告相关的制造业就业份额将占新增制造业就业的 61%，对这些州制造业就业需求的影响可能是巨大的。平均而言，这些州的制造业就业人数可能增加 41.5%。

接下来的 10 个州，在 2022 年占美国制造业就业的 27.7%，将因公告而获得 28.8% 的额外就业份额，其平均制造业就业将增加 13.8%。这些州占 2000 年至 2022 年间制造业工作岗位流失的 28.7%。

相比之下，其余的州——占 2022 年制造业就业的 52.7%，占 2022 年美国总就业的 55.5%，占 2000 年至 2022 年制造业就业损失的 56.1%——仅占与公告相关的新增就业份额的 10.2%。平均而言，这意味着其他州的制造业就业增长仅为 3.7%。因此，这些公告对占美国就业人口一半以上的州的影响很小，其影响也不会集中在 2000 年后制造业损失最多的州。

例如，考虑对“铁锈地带”（此处定义为伊利诺伊州、印第安纳州、密歇根州、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和威斯康星州）的影响。这些州对制造业就业的依赖程度过高。2022 年，这些州占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的 27.1%，但仅占美国总就业人数的 18.4%。“铁锈地带”的就业份额仅为 14.8%，这些州的制造业就业需求预计仅增长 7.3%，远低于美国总体制造业需求 13.3% 的增长（表 2）。已宣布的投资预计将创造 251,448 个就业机会。相当于这些州在 2000 年至 2022 年间失去的 145 万个制造业工作岗位的 17.3%。对于“铁锈地带”来说，这些投资并不代表重生。

4. 选举考虑

大多数共和党人反对 IRA，因为它负责这些投资的清洁技术层面，只有 24 名众议院共和党人支持 CHIPS 法案。尽管共和党缺乏支持，但宣布的投资并没有偏向于在 2020 年投票给任何一位总统候选人的州。拜登总统在 2020 年赢得

的州占 2022 年制造业就业的 53.6%，占 2000 年至 2022 年制造业就业下降的 63.5%。这些州从宣布的投资中获得的就业份额将达到 50.3%（见表 2）。

投资更多地集中在摇摆州（定义为在 2020 年选举中与获胜州的差距小于 3%的州）。其中三个州（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和佐治亚州）在与公告相关的制造业就业增长百分比方面排名前十。另一个摇摆州北卡罗来纳州的制造业就业增长了 19.4%，排名第 11 位（表 1）。这四个州有时是选举策略的焦点，强调摇摆的阳光地带州，这四个州在选举团中总共有 49 票。

在密歇根州（10.2%）、宾夕法尼亚州（1.1%）和威斯康星州（1.0%）等“铁锈地带”的摇摆州，与宣布相关的制造业就业增加幅度较小，这些州总共拥有 44 张选举票。

这些投资是否会产生政治影响还有待观察。这些投资可能会增加对投票支持这些计划的政客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党人将从中受益。但它们也可以增加对现任者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效果可能会更加平衡。如果这些投资是为了在政治上帮助政府，那么它们的重点是在西部和南部的边缘州，而不是“铁锈地带”州，特别是宾夕法尼亚州和威斯康星州，产生相对较大的影响。

这些政策的政治影响也可能与其经济影响不同。奥特等人阿尔（2024）报告称，虽然特朗普总统对中国征收关税的经济影响几乎没有积极影响，但确实是在政治上加强了共和党的支持。因此，类似地，这些计划在展示对工人的关心方面的表达作用最终可能比纯粹的经济影响更强大。

5.对总就业的影响

投资公告的制造业就业估计仅相当于美国总就业的 1.1%（表 1）。受影响最大的是亚利桑那州（8.2%）、其次分别是爱达荷州（6.7%）、俄勒冈州（4.5%）和西弗吉尼亚州（3.8%）。然而，即使在這些州，总体就业效应仍然相对较小。此外，除纽约州（2.1%）外，其余各州的就业增长率均低于 2.0%，其中 24 个州低于 0.5%。因此，这些投资不会从根本上改变美国就业的总体部门就业构成。考虑到对化石燃料相关就业的负面影响，它们的影响将使制造业就业份额增加远远不到 1%。

6.制造业就业的长期前景

美国劳工统计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每年都会报告未来十年美国各行业和职业的详细就业预测。其 2023 年 9 月的报告——可能考虑到了一年前通过的拜登计划的预期影响，以及随后一年宣布的大部分投资——预计在 2022 年至 2032 年期间，制造业就业人数将减少 113,500 人至 1270 万，而总就业人数将增加 470 万（表 3）。这些预测表明，制造业的就业份额将从 2022 年的 7.8% 下降到 2032 年的 7.5%。新投资对就业的影响忽略了抵消效应，但即使我们假设它们增加了 170 万个制造业就业岗位，并且在劳工统计局的预测中都被忽略了，这些投资也将使制造业就业份额增加到 8.5%——仅比 2022 年高出 0.7 个百分点。

但这些官方对制造业就业增长的预测表明这将夸大未来的制造业就业。在劳工统计局的预测中，拜登计划带来的任何就业增长都将被其他制造业的就业下降所抵消。

表 3：按行业划分的 2022 年至 2032 年美国就业的预计变化

Sector (NAICS code)	Change in number of jobs (thousands)
Total	4,665.5
Manufacturing (31-33)	-113.4
Food manufacturing (311)	81.2
Beverage and tobacco manufacturing (312)	34.4
Textile mills and textile product mills (313, 314)	-22.0
Apparel, leather and allied product manufacturing (315, 316)	-27.7
Wood product manufacturing (321)	-4.7
Paper manufacturing (322)	-44.1
Printing and related support activities (323)	-63.4
Petroleum and coal products manufacturing (324)	-1.7
Chemical manufacturing (325)	21.6
Plastics and rubber products manufacturing (326)	-5.9
Nonmetallic mineral product manufacturing (327)	-8.1
Primary metal manufacturing (331)	-28.5
Fabricated metal product manufacturing (332)	-7.1
Machinery manufacturing (333)	8.2
Computer and electronic product manufacturing (334)	29.8
Electrical equipment, appliance, and component manufacturing (335)	43.3
Transportation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336)	-87.7
Furniture and related product manufacturing (337)	-29.8
Miscellaneous manufacturing (339)	-1.3

NAICS = North American Industry Classification System

劳工统计局的报告预测，仅有六个行业的制造业就业实现增长，总共将增加 218,500 个工作岗位，其中一半以上来自食品、饮料和烟草行业。预计将增长的其他行业的就业人数包括电气设备（增加 43,300 人）；计算机和电子产品（减少 29,800 人，主要是因为半导体行业增加了 30,800 个工作岗位）；以及化学品（减少 21,600 人，主要是因为制药业增加了 19,100 个工作岗位）。

这些新增就业岗位不足以抵消其他 13 个行业的下降，这些行业的总数约为 332,000 个。其中包括汽车零部件行业约有 96,900 个工作岗位的减少，这在运输设备制造业预计将减少的 8.77 万个工作岗位中占了很大一部分，可能是因

为电动汽车行业。预计印刷业（63400 人）、造纸业（44100 人）、家具业（29800 人）、初级金属业（28500 人）、纺织业（22000 人）和服装业（7700 人）的就业人数也将减少。因此，尽管拜登计划和《chip 法案》所针对的行业（交通运输除外）预计会出现一些就业增长，但这些增长被制造业其他部门普遍存在的失业所抵消。

这些对制造业就业增长的估计可能过低，但分析指出，根据少数行业和项目的选择性轶事而不是对整个行业的全面考虑来宣布制造业“复兴”是危险的。

7. 结论

尽管它将刺激非传统地区制造业就业的快速增长，但拜登计划并没有带来美国制造业的广泛复兴，未来也不太可能实现。该计划对自 2000 年以来经历了大量制造业就业损失的“铁锈地带”州的影响可能是温和的，其影响不会显著改变美国劳动力市场的部门构成。

制造业在提供重建美国基础设施、推动数字革命和促进美国经济向脱碳转型所需的商品方面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由于其相对较小的总体就业份额——以及越来越倾向于雇佣受过更多教育的工人——该行业不再像过去那样为非大学生提供机会。尽管拜登的计划可能会实现重要的社会目标，但它们不太可能改善机会对于大多数没有大学学位的工人来说，也不太可能帮助美国大多数弱势地区。

随着拜登项目拨款的发放，可能会有更多的公告。然而，更新数据的结果不太可能改变这一分析的核心结论。即使额外的公告将制造业就业人数估计再增加 50%，制造业在美国整体就业中的作用也将非常有限。为了改善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工人和落后社区的前景，需要更多的政策，其关注范围远远超出制造业。

本文原题为“Is the United States undergoing a manufacturing renaissance that will boost the middle class?”。本文作者 Robert Z. Lawrence。Robert Z. Lawrence 自 2001 年以来一直担任非驻地高级研究员，现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阿尔伯特·L·威廉姆斯贸易与投资教授，其主要研究领域是国际经济学。本文于 2024 年 10 月发表于 PIIE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错误的恒等式导致糟糕的贸易政策

Maurice Obstfeld/文 赵元彬 / 编译

导读：本文探讨了美国贸易赤字及其对经济政策的影响，对基于宏观经济恒等式的贸易赤字理论进行了批判，指出这些理论常被误用来支持保护主义政策。本文分析了国民收入与产品恒等式以及国际收支恒等式的滥用，强调这些恒等式不能解释贸易赤字的成因或影响。文章指出，贸易赤字并不必然导致就业减少或经济增长放缓，而是反映了国内需求的强劲。作者还反驳了将贸易赤字与双边贸易赤字机械联系的观点，认为这种联系忽视了经济均衡关系。最后，作者发出警告，基于恒等式的简单化政策建议可能会造成意外的经济损害，而不能解决贸易赤字问题，同时呼吁进行更深入的经济分析，以制定有效的贸易政策。编译如下：

选举季关于贸易政策的辩论使人们重新关注美国长期存在的对外贸易赤字。包括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及其盟友在内的左翼和右翼政治派别的批评人士都认为，贸易赤字应为一系列所谓的弊病负责，其中包括美国经济增长放缓、就业机会减少、制造业衰退以及美国财富向外国所有者转移。

特朗普支持者减少美国贸易赤字的想法——比如对国际交易征收影响深远的税收或强迫美元贬值——都是基于赤字为何产生并持续的特定理论。除了宏观经济恒等式之外——根据定义，这些关系总是真实的，因此与一系列经济结果相一致——这些理论通常没有什么依据。宏观经济恒等式是必要的真理，因为它们反映了复式记账法所捕捉到的同样的现实：每笔经济交易都有买卖双方，当卖方卖出所购物品时，就会收到买方的付款。然而，这种同义反复的关系本身并不能确定贸易逆差的影响或原因。

例如，许多贸易怀疑论者援引“国民产出等于国内支出加上贸易差额”这一会计恒等式，得出进口必然会减少经济总产出和就业机会的结论。但美国贸易赤字上升并不一定意味着美国就业岗位减少。相反，它通常反映了强劲的需求，这种需求与进口一起推动了国内就业的增长。反之亦然：在经济衰退期间，当美国人失去工作并减少支出（包括进口）时，贸易逆差通常会缩小。

尽管经验证据与此相反，但许多人仍然严肃地援引宏观经济恒等式来支持他们钟爱的贸易赤字理论以及他们认为可以遏制赤字的政策。他们的推理通常会误诊赤字，并从经济实际运行方式的简单化角度出发。因此，他们的政策建议可能会造成巨大的附带损害，甚至不能保证贸易平衡或增加制造业就业机会。

这种智力上的花招并不新鲜：正如 Paul Krugman 十多年前所说“会计恒等式很重要；事实上，它们就是法律。”但它们应该为你描述人们的行为方式提供信息，而不是替代行为分析。显然，很少有人听进去。会计恒等式滥用仍在继续，同时在一个各国为了追求国家利益而更愿意将多边合作抛在一边的世界中变得越来越危险。

我将重点放在两个最常被滥用的宏观经济恒等式上：国民收入和产品恒等式，用来推断贸易赤字的影响；国际收支恒等式，用来推断赤字的原因。

滥用国民收入与产品恒等式

国民收入和产品（NIP）恒等式通常是贸易赤字（进口支出超过出口收入）导致经济增长放缓和就业机会减少的依据。这个恒等式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总产出（国内生产总值，或 GDP）必须由家庭消费、企业投资、政府购买或出口到国外。

国内生产总值=消费+投资+政府购买+净出口。

右边的最后一项是净出口（出口收入减去进口支出），即贸易差额。它之所以被包括在内，是因为国民消费、投资和政府采购的某些部分是从国外进口的，因此必须从上面的右侧减去这些部分（这些部分加起来等于进口总额），以使该恒等式真实地表示 GDP 如何在其可能的用途之间进行分配。上述关系之所以是一个恒等式，是因为 GDP 中在市场上出售的每件产品都是为了某种用途而购买的：复式记账法。

贸易赤字（净出口为负值）导致生产和就业损失的说法，直接源于对国民收入恒等式的肤浅应用。假设净出口进一步下降，导致贸易赤字增加，但右边的其他部分没有变化。那么这个恒等式就意味着 GDP 必须以相同的幅度下降。这开启了一条错误的推理路线，即贸易赤字扩大必然会拖累产出和就业。

最近的一个似是而非的例子来自制造业游说团体“繁荣美国联盟（Coalition for a Prosperous America）”，该组织写道：“美国的贸易赤字通过将美国消费者和企业花费的美元送到外国生产商那里，刺激了外国经济而不是我们自己的经济，从而减少了美国的 GDP。”特朗普的观点“美国在贸易中吃亏，而外国人在贸易中获利”也是基于同样的推理。特朗普的顾问 Peter Navarro 在 2017 年写道：“通过强硬而明智的谈判来减少贸易赤字，是增加净出口、提高经济增长率的一种方式。”他最近在右倾的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的“2025 计划（Project 2025）”政策议程的一章中重申了这一主张。“左倾”的经济政策研究所也直接将制造业就业岗位和工厂的损失归咎于美国的贸易赤字。

这一方法的支持者通常通过假设当贸易赤字上升时，经济购买了原本应该在国内生产的进口商品来衡量“贸易赤字导致的就业损失”。因此，他们声称，赤字的增加直接拖累了国内产出和就业。然而，他们的计算背后隐含的预测是，如果进口下降一定数量，等量的消费或投资需求将自动转向国内产品，而总消费和投资支出的总和保持不变。根据国民收入恒等式，他们认为，右侧的净出口将会增加，而其他右侧的数量不会有任何相应的变化，这必然会导致 GDP 的增加，而增加的数量恰恰是贸易差额改善的数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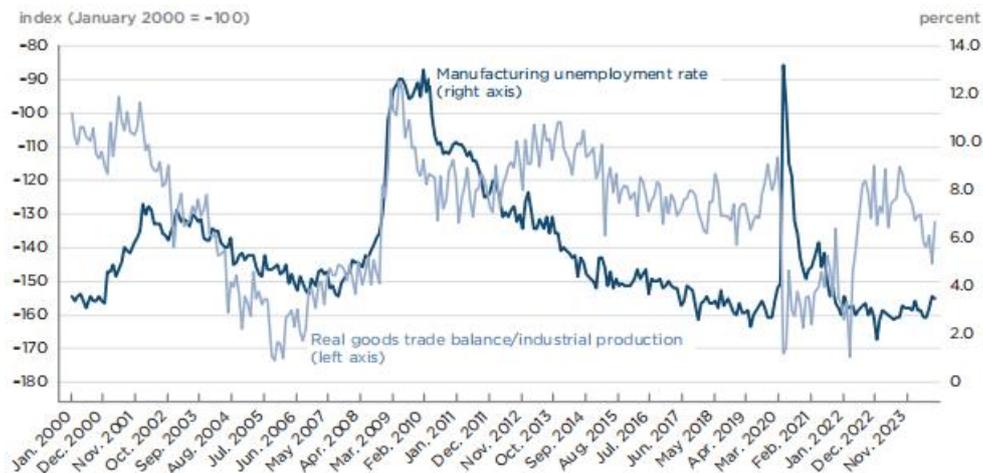
这一论点的缺陷在于，如果没有消费、投资或政府支出的相应变动，贸易赤字很少会发生变化，而贸易平衡与其他经济活动的互动方式主要取决于其发生变化的原因。变化的驱动因素非常重要。例如，如果国内消费或投资崩溃导

致进口需求下降和贸易平衡改善，那么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对国内商品的需求也将下降，最终结果是 GDP 的下降。

从数据上看，在贸易赤字缩小时，GDP 倾向于回落。例如，在美国经济衰退期间，贸易赤字通常会缩小，这反映了进口需求的下降。这一规律源于另一个与国民收入恒等式密切相关的恒等式：贸易顺差与国民储蓄和国内投资之间的差额密切相关。为什么会这样呢？如果我们对外国的出口超过我们从他们那里的进口，我们的国民储蓄不仅会流向更多的国内机器、建筑和研发，而且还会流向外国资产——外国给我们的借据，以换取他们没有通过向我们出口来支付的那部分商品。同样，贸易赤字必须通过出口借据来弥补——即对外国的负债——这意味着我们的储蓄少于我们的经济投资。但是，短期内储蓄的上升和投资的下降，两者都会减少我们的贸易赤字或增加我们的顺差，往往与经济繁荣无关——恰恰相反。出于这个原因，在大多数主要工业经济体中，贸易差额通常具有一定程度的反周期性，贸易赤字在繁荣时期上升，在衰退时期下降。

如图 1 所示，美国的这一模式很明显。这张图显示了自 2000 年以来美国制造业失业率与美国实际商品贸易差额之间的关系，贸易差额按工业生产比例计算。除了几个相对短暂的时期，当贸易赤字上升时，失业率没有上升的趋势。相反，贸易差额和失业率之间呈正相关，因此制造业失业率通常与商品贸易差额同步下降。

图 1 美国制造业失业率倾向于在美国商品贸易差额变得更负面时下降



注：实际货物贸易差额定义为名义余额除以制造业生产价格指数。

来源：美国人口普查局和经济分析局，经由美联储经济数据（FRED）提供。

忽视产生特定贸易差额的经济均衡关系的推理可能会给出极具误导性的政策结论。特朗普提出的对进口产品普遍征收保护性关税的建议似乎不言自明，它将使这些产品变得更加昂贵，从而抑制进口需求并改善贸易差额。但是，关税会使国际收支趋向盈余，从而导致本国货币在外汇市场上升值，使进口商品更便宜，出口商品对外国买家来说更昂贵，并在很大程度上抵销关税对贸易差

额的影响。最终的情况可能是，关税的主要影响是扭曲资源配置，使实际产出低于潜在产出。

货币升值符合这样一个现实：即为了在国内生产更多我们以前进口的商品，特别是对于一个充分就业的经济体而言，我们需要转移目前用于生产出口商品的资源。因此，出口将随着进口的下降而下降。从经验上看，进出口占 GDP 比重的季度变化是高度相关的。

将贸易赤字与总体经济的就业或产出机械地联系起来会产生误导，而以类似的方式从与个别国家的双边赤字中推断就业或产出损失则更糟。如果较小的对华贸易逆差与较大的对越南和墨西哥贸易逆差相联系，那么较小的对华贸易逆差，可能不会对总体进口产生影响。

贸易赤字，无论是总体贸易赤字还是双边贸易赤字，都不一定会转化为就业和收入损失——当然也不会转化为容易量化的损失。

滥用国际收支恒等式

基于国际收支（BOP）恒等式的肤浅论断会导致特别严重的后果，因为它们将贸易差额、全球金融流动、外汇干预以及美国作为世界首要储备和工具货币发行国的独特地位等热点话题联系在一起。评论家们援引国际收支恒等式，错误地认为流入美国的外国资金，无论是私人还是官方资金，都是美国贸易赤字的根源。然后他们继续提出对这些流入资金征税的补救措施，但往往很少考虑到这类金融关税的更广泛影响。

然而，国际收支恒等式本身并不能证明这些结论。相反，它反映的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道理：当美国居民向外国居民出售东西并收到相应的美元（或欧元，或日元）付款时，美国人必须以某种方式使用或储存这笔付款。当然，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从美国或其他地方购买东西的外国居民。

更具体地说，国家之间的贸易可分为两大类：货物和服务/资产（即不同类型的金融工具）。在国际收支统计中，经常账户记录货物和服务的净贸易（出口额减去进口额），金融账户记录股票和债券等资产的净贸易（本国在国外购买资产的净额减去外国在美国购买资产的净额）。

作为美国居民，当我向日本出售一件商品，并收到用来支付的东京的日元存款时，美国的经常账户余额就会随着这个商品价值的增加而增加（以反映出口的额外物品），美国金融账户也会随着商品价值的增加而增加（以反映我收到的外国资产，即用来支付的在日本的日元存款）。经常账户的增加必须等于金融账户的增加。这只是复式记账法的实际应用——它对任何一笔交易的原因或结果都没有任何影响。如果日本买家用纽约银行存款中的美元支付给我呢？金融账户仍然以相同的数额增加，因为如果外国人出售位于美国的资产，这些是负的外国购买，对我们欠外国人的净负债的影响与我们购买外国资产的正影响相同。

然而，如果“出售的货物等于收到的资产”这一原则适用于我们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每一笔交易，那么我们可以将这些交易加总起来，并得出以下结论：

经常账户余额=金融账户余额。

这是最简单形式的国际收支恒等式。

上述恒等式在定义上是正确的。除了限定可能出现的结果都必须满足该恒等式，它对其组成部分的驱动因素或政策效果没有任何影响——这有点像是在说我们不会考虑需要暂停算术法则的结果。尽管如此，事实证明，对于一些政策分析家来说，从国际收支恒等式中推导出极强的行为预测太有诱惑力了。当然，这些预测在逻辑上是可能的结果——它们也没有明显违反算术法则——但国际收支恒等式本身并不支持它们成为可能的结果，也不支持它们接近被广泛接受的经济行为原则所暗示的量化范围。

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 Pettis）是一位颇具影响力的作家，他从国际收支恒等式中推导出了影响深远的真理。在 2024 年的一篇论文中，他从恒等式中得出以下结论：

只要顺差经济体能够继续用其顺差收益在美国购买资产，美国的贸易赤字就不可能下降。换句话说，美国别无选择，只能通过赤字来平衡世界其他国家的顺差。

他接着建议美国通过征税来抵御外国资金流入的影响，从而减少其经常账户赤字（我曾批评过这一想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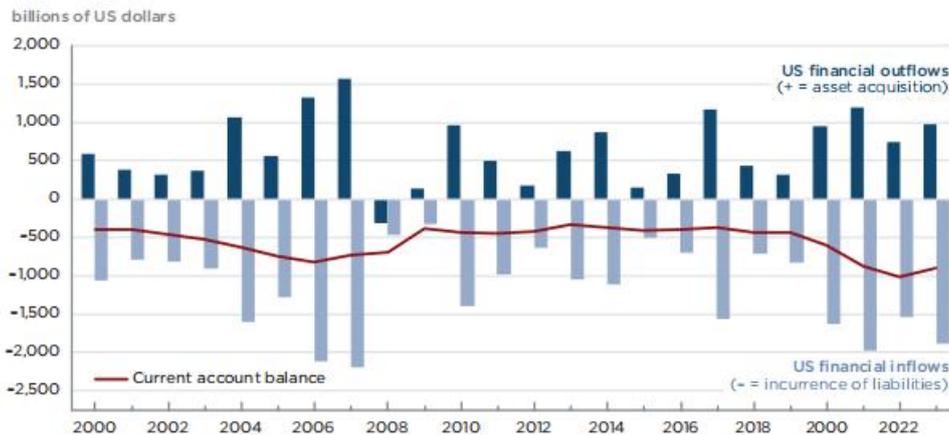
诚然外国对美元资产需求的激增会使美元升值，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美国贸易赤字扩大，但认为美国在这种情况下“别无选择”只能扩大赤字的观点是不正确的。美国可以采取任何行动来缓解这一结果，包括削减联邦预算赤字，同时在必要时放松货币政策，以支持国内充分就业。

一些人认为，美元作为主要国际货币的地位导致了全球对美元资产独特而持续的需求，而这种需求只有在美国进口大于出口的情况下才能得到满足，即通过发行世界希望持有的美国证券来为其经常账户赤字融资。但国际收支恒等式并不一定意味着这一点。要想知道原因，回想一下美国金融账户余额等于美国居民购买海外资产净额减去外国居民购买美国资产净额（就像贸易差额等于出口减去进口）。然后，将国际收支恒等式重写为

经常账户余额=美国购买外国资产净额-外国购买美国资产净额。

原则上，美国和外国居民可能有充分的理由简单地交换资产——也许外国投资者看重美元的安全性和流动性，而美国投资者则在海外寻求更高的回报。如果是这种情况，美国居民可以满足外国人对美元资产的需求，同时从他们那里购买等值的外币股票和债券，而不改变经常账户。

图 2 美国的资金流出和流入总额远大于其差额，即经常账户余额



来源：美国经济分析局，美国国际交易。

上述情况并非假设。图 2 分别显示了美国巨量的金融总流出和总流入，这两项在前面恒等式的右侧。这些流动的规模淹没了规模小得多的经常账户余额，后者等于它们的差额，即资金净流出。谁又能说外国对美国资产需求的增加不能通过美国投资者持有更多外国资产的同等愿望所满足，而不需要美国进行任何新的净借款呢？美国居民在海外持有大量外币证券。这反映出，各国可以通过商品和服务贸易或者通过交换资产实现多样化来互惠互利。

尽管欧元区是世界第二大储备货币和锚货币的发行国，但自 2012 年初以来，欧元区在大多数季度都实现了经常账户盈余，最长的例外是 2022 年 2 月俄乌冲突后商品价格震荡的几个季度。为什么面对亚洲的资金外流，欧元区可以“选择”保持盈余，而美国却不能？适当的美国宏观经济政策不仅可以改变美国的地位，还可以改变全球平衡，引发外国储蓄和投资的变化，从而实现美国经常账户的平衡。但华盛顿的政客们并没有兴趣控制联邦预算。

国际收支恒等式与中央银行外汇干预

当中央银行买卖外币（例如外汇市场干预）时，国际收支恒等式继续适用。届时，中央银行将作为金融账户交易的参与者参与其中。但是，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变化，国际收支恒等式也不会突然变得不仅限于一个普通的会计原则。这并不妨碍一些分析师利用它做出强有力但毫无根据的预测。这个问题与美国尤其相关，因为在任何外汇干预中美国货币都是最常见的一方。

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是发行国持有的主要货币资产，它们定期进入市场用储备换取本国货币。在这种情况下，在短期内会发生两种相互抵消的资金流动，使金融账户在中央银行干预时保持不变：例如，如果日本银行用本国货币（日元）购买美元，那么日本就会有相应的资金流出（日本银行获得了对美国的债权），但同时也获得了同等的资金流入，因为美元卖方对日本拥有同样多的日元债权（又是复式记账法）。换句话说，日本银行在国外购买净资产，但这笔交易正好被接受日本银行付款的外国人购买日本资产的净额抵消，从而使金融

账户保持不变。前者是由中央银行进行的储备金交易，第二种是由外方进行的非储备交易。我们可以在不影响国际收支恒等式有效性的前提下，从概念上区分恒等式中的两类交易，从而得出结论：

经常账户余额=非储备金余额+储备金余额。

理解这种恒等式的一个简单方法是认识到，如果一个国家有经常账户盈余（出口超过进口），那么外国人必须用资产向该国支付差额。因此，其境内的某个人——仅有的两种可能性是非中央银行实体或中央银行——必须收购这些资产。美国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持有的外汇储备极少，也很少干预外汇市场，但其货币却是世界主要储备货币。尽管如此，国际收支恒等式的最后一种形势仍然适用——毕竟，如果它不适用，它就不可能成为一种恒等式。就美国而言，储备金余额主要反映外国中央银行的美元交易，而不是美联储的外币交易，因此，当外国中央银行购买美元时，储备金余额为负值（因为当外国中央银行购买外国资产时，美国对外国人产生了额外的负债）。例如，美国可以通过向外国非中央银行实体或外国中央银行借款来为净出口赤字融资。而如果美国有净出口盈余，外国人购买的美国出口商品超过其对美国出口的部分，就需要由外国中央银行减少其对美国的债权（从而损失外汇储备）或由美国居民对外国非中央银行居民的净债权的净增加来融资。

滥用国际收支恒等式的一个突出例子是预测美国贸易伙伴进行外汇干预的影响。如果日本中央银行通过买入美元资产和卖出日元干预外汇市场——如果它希望抵制日元对美元汇率的上涨，它就可能会采取这一行动——那么国际收支恒等式中的日本储备金余额必须按照其干预的金额增加。因此，这个恒等式意味着，为了平衡这一增长，必须同时发生另外两个国际收支变化：（1）日本经常账户余额上升，（2）其非储备金融余额下降。在没有经济行为分析的帮助下，我们无法判断这两种变化的大小（或者实际上说是符号）。我们所知道的是，这两个平衡变化加总必须达到日本官方干预的程度。

此外，从美国的角度来看，日本的官方美元购买代表着美国储备金余额的同等下降。同样，两件事的某种组合必须发生：（1）美国经常账户余额下降；（2）美国非储备金余额上升。同样，如果没有更多的信息，就无法知道这些变化的符号或规模。我们所知道的是，它们必须合计为由于日本中央银行（BoJ）购买美元资产导致的美国外汇储备金余额的下降。

尽管存在固有的不确定性，Michael Pettis 还是声称自己确切地了解对两国国际收支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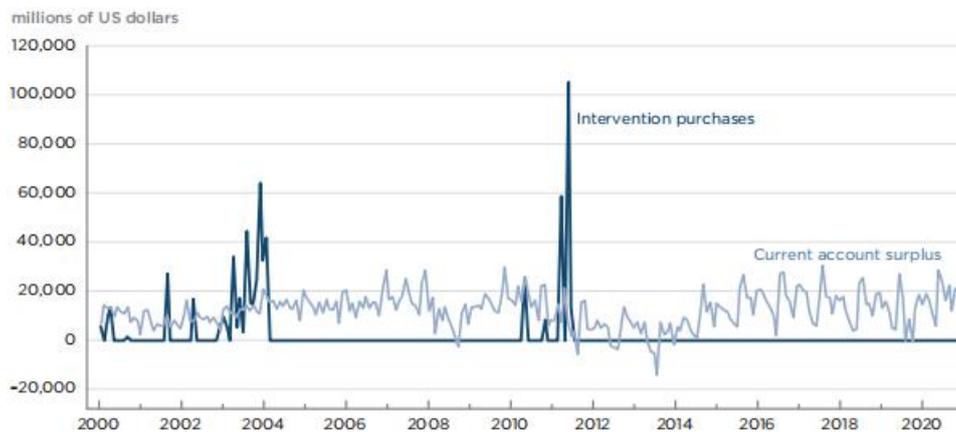
如果外国政府干预本国货币并积累美元，它们就会压低本国货币的价值，并使经常账户盈余与其净购买量完全相等。。反之亦然：因为其贸易伙伴正在积累美元，美国必须出现相应的经常账户赤字，这意味着总需求必须超过总产出。在这种情况下，说美国人的消费超出了他们的支付能力是一种同义反复。

但关于美国的反应，唯一的同义反复就是我上面所描述的：日本干预性购买美元所导致的美国资金流入必须被更高的美国经常账户赤字和更高的美国资金流出的某种组合所抵消——而不仅仅是由美国经常账户的变化来抵消。根据国际收支恒等式，日本也可以得出相应的同义反复。断言日本中央银行干预购买美元增加了日本的经常账户盈余，并增加了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其数额与干预的数额相等，这绝对不是同义反复，在实践中也远非如此。

干预可能会导致日元贬值，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日本经常账户盈余有所增加。干预肯定不会导致美国经常账户余额出现同等幅度的下降。相反，对日本盈余增加的对应赤字将由一系列贸易伙伴分摊（尽管日本央行选择以美元而不是其他主要货币进行干预）。原因很简单：当日本中央银行在外汇市场买入美元、卖出日元时，日元对所有外币都会贬值，而不仅仅是美元。

如图 3 所示，即使粗略地看一下数据，也会发现日本的经常账户余额并没有因其干预性购买美元而一举得到改善。这两个系列之间的相关性非常接近于零。日本只是间歇性地进行干预，但我们也可以在图 4 中看到更经常进行干预的国家韩国的数据。与日本的情况一样，干预购买与经常账户余额之间的相关性远非完美，但在韩国的情况是轻微正相关，自 2000 年以来相关系数为 0.25。

图 3 日本银行外汇干预性购买与其经常账户余额无关



来源：月度干预数据来自 Adler-Chang-Mano-Shao 干预数据集，网址为 <https://sites.google.com/site/ruimano/data/fx-intervention-dataset>；日元的经常账户数据来自 CEIC，使用联邦储备系统理事会通过联邦储备经济数据（FRED）提供的美元/日元月度汇率转换为美元。

图 4 韩国银行外汇干预购买与其经常账户余额只有轻微的相关性



来源：每月干预数据来自 Adler-Chang-Mano-Shao 干预数据集。https://sites.google.com/site/Ruimano/Data/FX-intervention-dataset；经常账户数据来自 CEIC。

像 Pettis 这样的论点很有诱惑力，因为从表面上看，它们似乎是建立在不可抗拒的会计真理之上的。如果日本中央银行购买了 10 亿美元，那么日本作为一个国家对美国的债权不是增加了 10 亿美元吗？而后者不是同时又从日本借了 10 亿美元吗？如果是这样的话，国际收支恒等式是否意味着日本的经常账户盈余和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都增加了 10 亿美元？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推理链的问题所在了。第一个问题没有区分总债权和净债权，因此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是“不一定”。

结论

对美国外贸赤字危言耸听的观点可以在各个政治派别中找到，但如今最响亮的哀叹来自右翼，前总统特朗普的经济团队正在积极规划他们认为可以减少赤字的政策。正如他的美国贸易代表 Robert Lighthizer 在 2023 年的一部著作中所阐述的，可能的方法包括要求进口商从出口商那里获得进口许可证——这一计划让人想起 20 世纪 30 年代在贫穷的发展中国家中欧采用的外汇管制制度——对资本流入征税，以及 Lighthizer 的首选方法——关税。此外，美元贬值政策也在酝酿之中。

这些错误的政策都将是破坏性的，甚至不能确保取得预期的经济结果。他们的动机是错误的信念，这些信念往往得到天真地使用经济核算恒等式的支持，即贸易赤字损害就业和增长，或者是外国强加的，试图剥夺美国的财富。

国民收入与产品恒等式和国际收支恒等式这两个关键的宏观经济恒等式已被广泛滥用，成为采取激进政策平衡美国贸易的理由。这些恒等式描述了宏观变量之间必须保持的关系，但如果没有进一步的行为推理，它们就无法得出有效的预测或建设性的政策结论。

贸易赤字需要在当前和未来消费之间进行跨期权衡；它们可能是良性的，但也可能是由政策或市场缺陷造成的，例如不可持续的政府预算赤字或金融不

稳定。当一个国家像美国一样有巨额外债时，贸易赤字可能不会永远持续下去。面对这些问题，基于恒等式的推理尤其危险，因为它掩盖了肤浅的解决方案可能造成的附带损害。更好的办法是找出并直接纠正导致过度贸易赤字出现和持续存在的扭曲现象。

本文原题为“Mistaken Identities Make for Bad Trade Policy”，作者为 Maurice Obstfeld。本文是由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成员撰写的工作论文，发表于 2024 年 10 月，[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打破银行的信息垄断：存款数据共享的理由

Jin Cao, Emilia Garcia-Appendini, Cédric Huylebroek / 文 张丝雨 / 编译

导读：现有银行通常对其借款人保持信息垄断，这使得借款人难以转向竞争性贷款机构或协商更好的贷款条款。本文认为，存款关系可能是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案，从而促进更具竞争力的贷款市场。研究表明，与竞争银行有存款关系的企业显著更可能更换贷款机构。与此同时，银行会为那些在其银行开立存款账户的企业提供更优惠的贷款条件。这些研究结果对当前的政策举措具有重要意义，如开放银行和数据共享、存款市场改革以及竞争政策等领域。编译如下：

政策制定者在改善小企业获得更具竞争力的融资方面面临的关键挑战是，现有银行对其借款人保持信息垄断，使小企业难以转向竞争性贷款机构或谈判获得更好的贷款条件。这种信息垄断本质上允许现有银行收取更高的利率并获取信息租金，从而导致套牢问题和投资效率低下（Sharpe 1990; Rajan 1992; Schenone 2010）。最近的研究发现（Cao et al.2024），存款关系可以解决这一套牢问题，从而使得贷款市场更具竞争力。特别地，我们发现企业与竞争银行之间的存款关系可以缓解现有银行的信息垄断，改善企业切换贷款机构的能力，并获得更具竞争力的贷款条件。

存款关系的力量

基于挪威企业与银行之间存贷关系的综合数据，我们发现存款关系显著降低了在位银行的信息优势。这是因为当公司在多家银行开设存款账户时，竞争性贷款机构可以通过交易历史观察到企业的财务健康状况，这些信息有助于在现有银行和竞争银行之间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

这一影响十分显著。我们的分析表明，与竞争银行存在存款关系的企业切换贷款机构的可能性高出 8 个百分点，这相当于在基线切换率的基础上提高了 50%。

如图 1 所示，约 20% 的公司保持着比贷款关系更多的存款关系，这为竞争加剧创造了机会。此外，我们的数据显示，约 40% 的成功切换贷款机构的企业在切换前就已与新银行建立了存款关系（图 2）。

图 1 公司-银行关系的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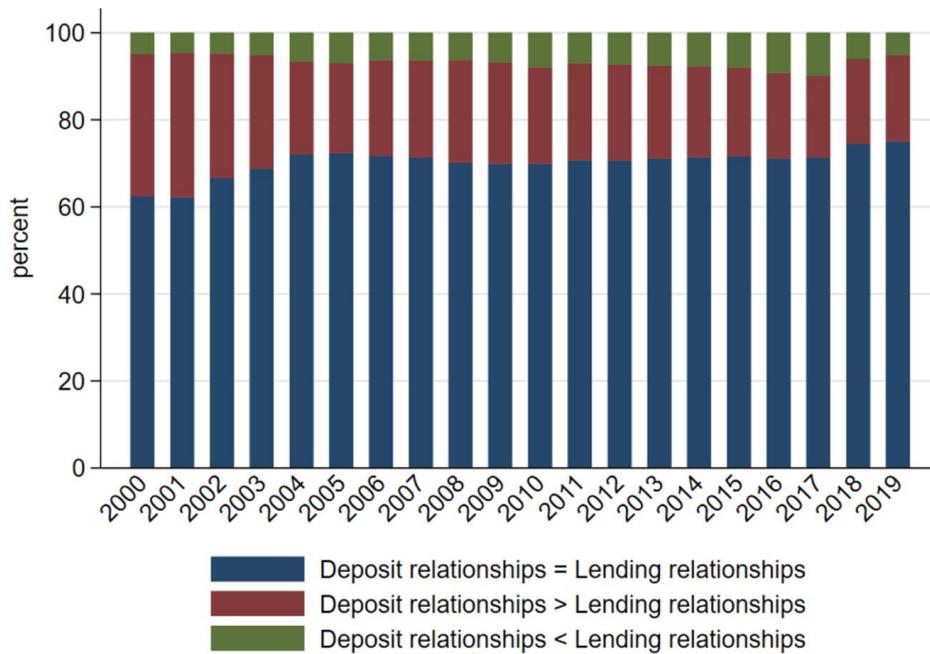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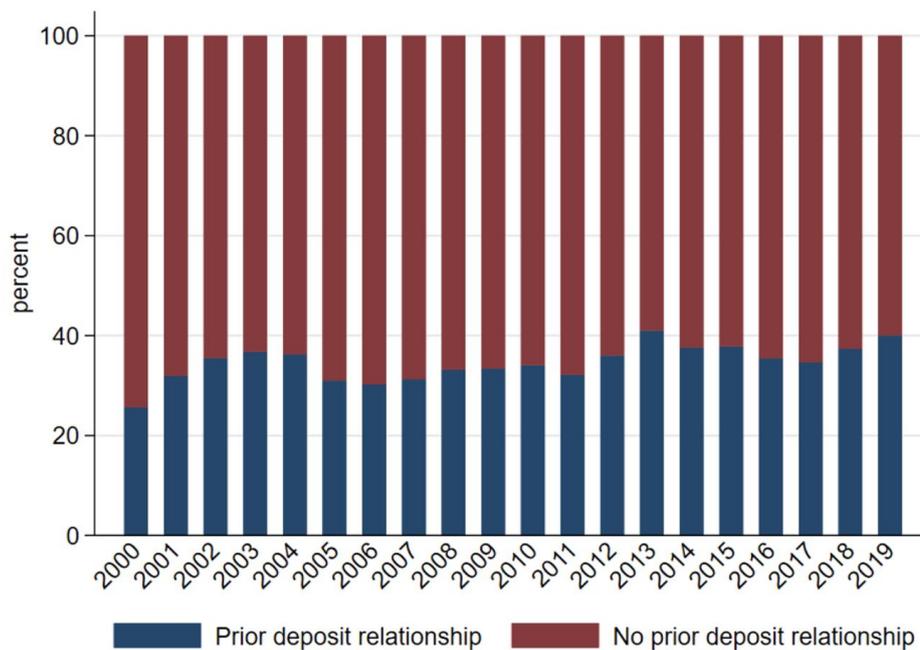


图 2 已有存款关系的转换公司比例



转向有存款关系的银行的公司也受益于更好的贷款条件，因为我们发现，与没有存款账户的公司相比，竞争银行为那些在其处持有存款账户的企业提供了更优越的贷款条款。

为什么存款关系很重要

与这些结果是由存款关系的信息价值驱动的想法一致，我们的研究表明：

- (1) 研究结果在交易账户中最为显著，因为交易账户提供了详细的支付数据；

(2) 当竞争银行的信息劣势更明显时（例如对于年轻的、信息不透明的公司），研究结果更加显著；（3）存款关系能够提高银行筛选潜在借款人的能力。

这表明，观察公司的存款账户活动有助于银行克服“赢家诅咒”，这种现象通常会阻止银行积极竞争与其他银行有贷款关系的公司。

政策启示

我们的研究结果对当前的政策举措具有重要意义：

- 开放银行和数据共享。我们记录的存款关系的信息价值为扩展开放银行框架提供了支持，使公司能够更好地控制其交易数据。通过允许企业轻松地与潜在贷款人分享其与银行相关的历史信息，政策制定者可以培育更具竞争力的信贷市场（另见 Babina et al.2024）。
- 存款市场改革。旨在降低存款市场转换成本——如欧盟的《支付服务指令第二版》（EU Payment Services Directive 2）降低了开设存款账户的行政负担——可能会对信贷市场产生积极的溢出效应。更广泛地说，让企业更容易在多家银行开设存款账户，最终可能会增加贷款机构的竞争。
- 竞争政策。银行监管机构应考虑存款市场结构如何影响贷款市场竞争。在吸收存款方面保持良性竞争的政策，可能会对企业获得竞争性融资产生积极的溢出效应（另见 Drechsler et al.2017）。

展望未来

虽然人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通过直接措施来增加贷款市场的竞争上，但我们的研究表明，存款市场动态也发挥着至关重要、但往往被忽视的作用。随着政策制定者继续为开放银行和数据共享制定框架，理解存款和贷款关系之间的这些联系变得越来越重要。

因此，我们的研究提出了关于银行市场相互关联性质的新问题。数字银行和金融科技创新如何影响这些动态？替代数据来源能否在减少信息不对称方面发挥类似作用？随着金融行业的不断发展，这些问题对于设计有效的政策框架以促进竞争性和高效的银行市场至关重要。

本文原题为"Breaking banks' information monopoly: The case for deposit data sharing"。作者为 Jin Cao, Emilia Garcia-Appendini 和 Cédric Huylebroek。Jin Cao 是挪威中央银行的一名高级研究经济学家，拥有德国慕尼黑路德维希-马克西米利安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Emilia Garcia-Appendini 拥有西班牙庞培法布拉大学的经济与金融学博士学位，目前是挪威中央银行的一名高级研究经济学家，也是圣加仑大学银行和金融中介学的副教授。Cédric Huylebroek 是比利时鲁汶大学的博士研究生，曾在国际清算银行研究部、比利时国家银行和挪威中央银行担任访问研究职位。本文于 2024 年 11 月刊于 VOXEU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货币政策的绿色困境

Luca Fornaro, Veronica Guerrieri, Lucrezia Reichlin / 文 张丝雨 / 编译

导读：加速向绿色经济的转型势在必行。本文指出，绿色转型将为中央银行带来权衡取舍的挑战。淘汰污染性技术可能会在短期内放缓生产率增长，从而带来通胀压力。如果中央银行选择“视而不见”，允许通胀暂时上升，那么通胀预期可能会失去锚定。相反，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将导致失业率上升、绿色技术投资减少，并可能对国内生产总值（GDP）和绿色转型造成永久性损害。通过财政和信贷政策支持绿色投资，或许是应对这些权衡取舍的最佳选择。编译如下：

加速向绿色经济转型已经成为各国共识（Bilal and Kanzig 2024）。在绿色转型期间，中央银行将面临哪些挑战？在最近为国际清算银行撰写的一份报告（Fornaro et al.2024）中，我们提出了一个框架来解决这个问题。

正如让·皮萨尼-费里和塞尔玛·马赫福兹（Pisani-Ferry and Mahfouz 2023）所说，我们的出发点是，转型将推动经济从依赖污染性技术转向清洁技术。绿色法规通过限制污染技术的使用，提升污染产品相对于清洁产品的价格。除非绿色技术能快速发展并被广泛采用，否则较低的污染技术可得性将放缓生产率增长。正如我们所说，这些力量将使央行面临“绿色困境”。

绿色转型的通胀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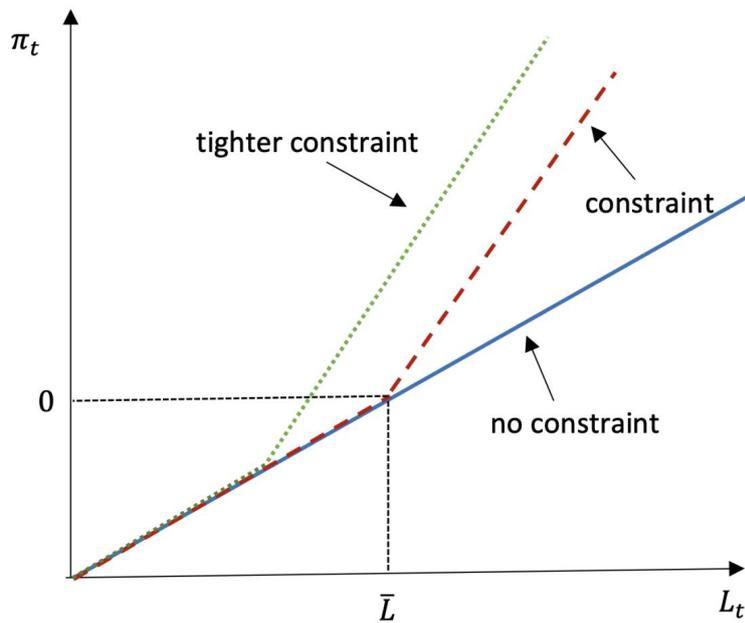
我们考虑一个经济体，其中生产两种类型的中间产品：清洁产品和污染产品。清洁产品是使用无污染技术生产的，而污染产品的生产会降低环境质量。与新凯恩斯主义传统一样，由于名义（工资）刚性，货币政策会对实际经济产生影响。

我们将绿色转型建模为逐渐收紧污染产品的生产上限或供应限制。这一约束可能代表绿色法规对碳排放的限制，如欧盟排放交易体系规定的排放上限，甚至是旨在实现某些减排目标的碳税政策。潜在的假设是，监管机构将气候变化的长期成本内部化，尽管我们没有明确地对它们进行建模。

当污染产品的供应受到管制限制时，它们的相对价格就会上涨，从而导致生产向清洁产品的理想重新分配。然而，污染产品相对价格的上涨是通胀压力的一个来源（另见 Del Negro et al.2023）。

更准确地说，对污染产品的供应约束会导致非线性的总体菲利普斯曲线：当就业水平足够低时，对污染产品的供应约束较为宽松，菲利普斯曲线相对平坦；但当就业水平超过某一门槛，使供应约束生效时，菲利普斯曲线变得陡峭（图1）。在后一种情况下，就业的增加不仅会导致名义工资增长的上升，还会导致污染产品相对价格的上升。随着绿色法规的收紧，污染产品的供应约束将在较低的就业水平上开始生效。结果，菲利普斯曲线更多的部分变得更陡峭。

图 1 绿色转型期间的非线性菲利普斯曲线



这一观察结果有两个重要含义。首先，在绿色转型期间，央行将面临通胀和就业之间更糟糕的权衡。第二，由需求冲击驱动的经济周期波动可能导致高通胀波动。直观地看，当污染产品的供应约束被触发，导致其相对价格和总体通胀的急剧上升。相反，当总需求较低时，污染产品的供应约束松弛，通胀有所下降，但不足以弥补需求驱动型繁荣期间的通胀上升。

绿色转型中的内生技术变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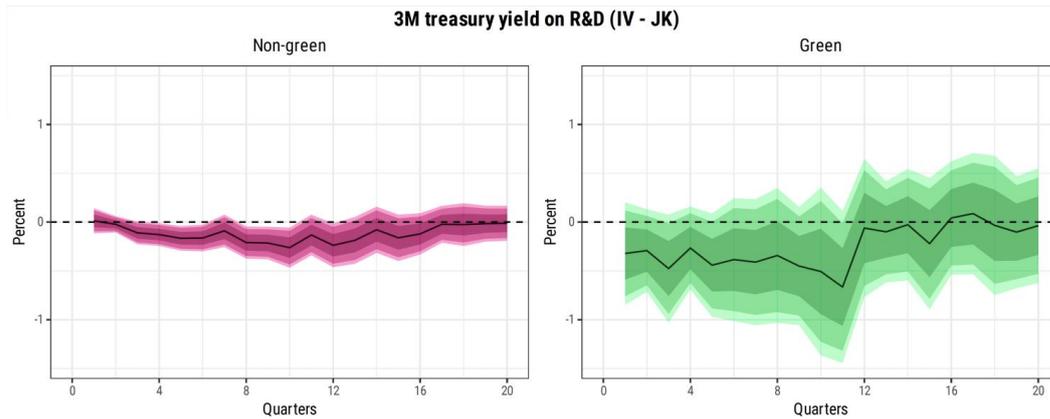
绿色技术的开发和采用有可能协调碳排放减少和健康的生产力增长（Hemous et al. 2009）。考虑到这种影响，我们在模型中引入了污染性技术和绿色技术的内生技术变迁。现在，对污染产品的更严格的供应限制促进了投资向绿色技术的重新分配，减轻了因逐步淘汰污染商品而造成的生产力损失。然而，这种力量的强弱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货币政策立场。

直观地看，在我们的模型中，货币紧缩会抑制投资。但是，更有趣的是，我们发现这一效应对绿色技术的影响更大。这种现象有两个原因。首先，货币政策通过其对利率和资本成本的影响来影响投资。然而，由于绿色法规的逐步收紧，生产污染产品面临的时间范围较短，因此它们的投资决策对利率变化不那么敏感。

第二，货币政策通过决定总需求和企业利润来影响投资。例如，货币扩张刺激投资，因为总需求的相应增加使企业建立生产能力更有利可图。但健康的总需求特别有利于绿色投资，因为环境监管阻止了污染企业的扩张。这给央行带来了额外的权衡。狭隘地专注于在短期内将通胀维持在目标水平，可能会阻碍绿色投资，并在较长时期内损害生产率，这意味着以后会出现更高的通胀。

通过研究绿色企业的投资如何应对货币政策冲击，我们提供了一些新的实证证据来支持这一效应。例如，图 2 显示，意外的货币紧缩对绿色企业的研发投资产生了特别负面的影响。我们的结果与从业者的观点一致，即货币和金融因素对绿色投资特别重要（Martin et al. 2024）。Aghion 等人（2024）的最新证据也表明，德国汽车公司对绿色技术的投资对货币冲击特别敏感。

图 2 25 个基点的负货币冲击对绿色和非绿色研发投资的影响（美国上市公司的 COMPUSTAT 数据）



这一实证证据表明，考虑货币政策对绿色投资的影响至关重要。

中央银行的绿色困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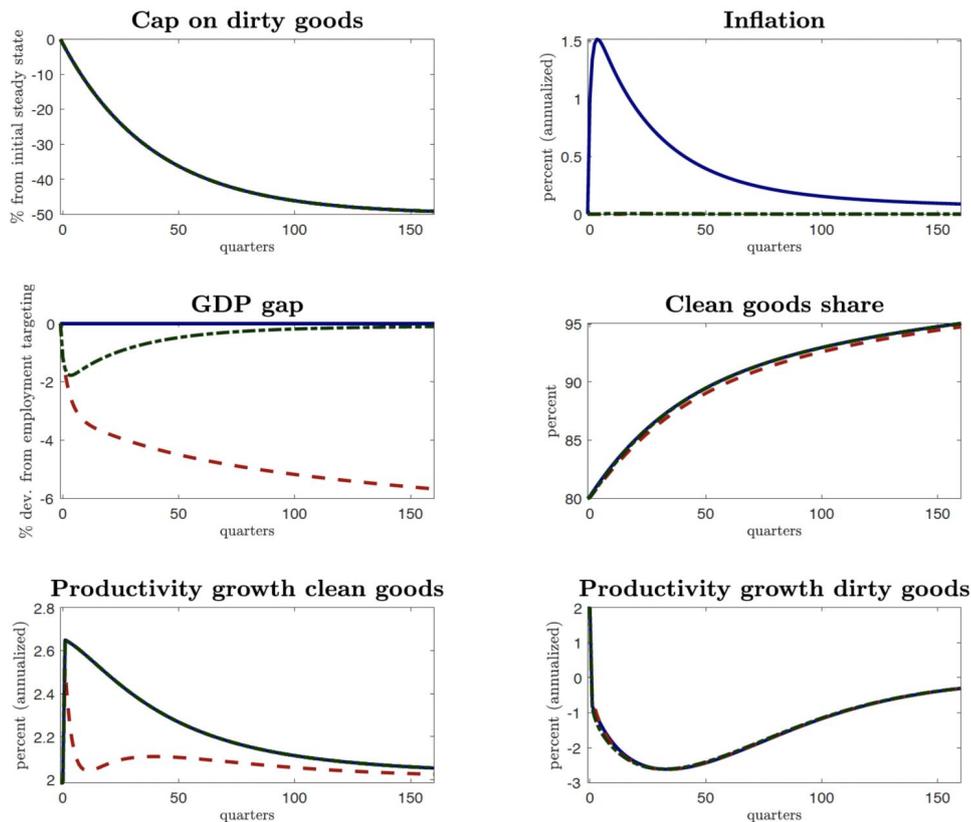
我们现在准备使用我们的框架来考虑央行在绿色转型期间将面临的困境。

图 3 显示了不同策略配置下绿色转型的模拟路径。

一种选择是“忽视”由逐步淘汰污染技术引发的通胀冲击（蓝线）。这种方法的好处是，通胀的暂时上升会加速逐步淘汰污染技术所需的污染商品相对价格的上涨。此外，“忽视”方法保证了过渡期间的高就业率。但是，即使我们没有明确地对此进行建模，高通胀也有可能导致通胀预期的脱锚。

第二种可能性是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抑制由绿色转型（红线）引发的通胀脉冲。这一策略的问题在于，将通胀维持在目标水平需要高度的经济疲软和大量失业。此外，紧缩的货币政策将阻碍绿色投资。一方面，这将导致永久的生产力和 GDP 损失。另一方面，这将减缓向清洁经济的过渡。

图 3 绿色过渡期间的不同政策组合



绿色财政和信贷政策的作用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绿色转型对央行来说可能是一个重大挑战。但货币、财政和信贷政策之间的协调可能是平稳过渡的关键，使我们经济的绿色化与高经济活动和低通胀相协调。我们认为，支持绿色投资的财政补贴和定向信贷政策可能发挥关键作用。

这一政策组合如图 3 中的绿线所示。我们假设货币政策足够紧缩，以在转型期间将通胀维持在目标水平，但财政补贴和定向信贷政策使绿色投资免受货币紧缩的负面影响。

有两个结果值得强调。首先，补贴绿色投资能够在实现低通胀的同时，推动绿色转型的迅速推进。其次，将通胀维持在目标水平所需的产出损失现在要小得多，而且是暂时的。这是因为支持绿色的财政和信贷政策抵消了货币紧缩对中期生产率和产出的负面影响。此外，绿色部门生产率的快速增长起到了抑制通胀的作用，降低了央行实施紧缩货币政策以维持通胀目标的必要性。

总之，促进绿色投资的政策干预不仅有助于平衡淘汰污染性技术与生产率增长的关系，还可以在绿色转型期间发挥有用的宏观经济稳定作用，补充传统的货币政策，以确保高经济活动和低通胀的双重目标。

本文原题名为"A green dilemma for monetary policy"。作者为 Luca Fornaro, Veronica Guerrieri 和 Lucrezia Reichlin。Luca Fornaro 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获得博士学位，是国际经济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庞培法布拉大学的兼职教授和巴塞罗那经济学的研究教授。Veronica Guerrieri 是芝加哥布斯商学院的罗纳德·E·塔尔森经济学教授（和威拉德·格雷厄姆学者，曾在麻省理工学院（MIT）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并于 2006 年加入芝加哥布斯商学院的教职团队。Lucrezia Reichlin 是伦敦商学院的经济学教授，布鲁盖尔研究所的外部研究员，以及欧洲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的特聘研究员。本文于 2024 年 11 月刊于 VOXEU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本期智库介绍

Peter G.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PIIE)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简介：由伯格斯坦（C. Fred Bergsten）成立于1981年，是非牟利、无党派在美国智库。2006年，为了纪念其共同创始人彼得·乔治·彼得森（Peter G. Peterson），更名为“彼得·乔治·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PIIE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10名，全球30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4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1名。

网址：<http://www.piie.com/>

Brussels European and Global Economic Laboratory (Bruegel) 布鲁塞尔欧洲与全球经济实验室

简介：布鲁塞尔欧洲与全球经济实验室成立于2005年，是主要研究国际经济的独立、非理论（non-doctrinal）的智库。致力于通过开放、基于事实并且与政策有关的研究、分析和讨论，对欧洲及全球经济政策制定作出贡献。Bruegel的成员包括欧盟各国政府以及一些领先的国际公司。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Bruegel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16名，全球30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9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3名。

网址：<http://www.bruegel.org/>

The Center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CEPR) 经济政策研究中心

简介：经济政策研究中心成立于1983年。它包括七百多位研究人员，分布于28个国家的237家机构中（主要是欧洲高校）。其特点是提供政策相关的学术研究、并关注欧洲。Voxeu.org是CEPR的门户网站，受众为政府部门的经济学家、国际组织等。它的文章多为与政策相关的工作论文初稿，比财经报纸专栏更为深入，同时比专业学术文章更加易懂。

网址：<http://www.voxeu.org/>